胡適作品集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文存 第二集第一卷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封面照片：六十九歲時的胡適先生
（譚旦冏攝於台中故宮博物院）
封面「胡適文存」題字：胡適先生手迹
蝴蝶頁篆刻：齊白石（陰文「適之」）
臺靜農（陽文「胡適的書」）
封面、蝴蝶頁及內頁插圖設計：黃金鐘



身後百年遇知己的章實齋

章實齋(1738-1801)是清代學者，一生貧困不得志，卻留下許多不朽著作。胡適是章實齋的百年知己，在章氏死後一二一年，他寫成了「章實齋先生年譜」，並大力發揚他的學說。

章實齋先生夫婦遺象



姚達人先生熱心搜求實齋傳記材料，果然訪得此像，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了

胡適敬記 廿九，六

受胡適刺激而寫作的老前輩

梁啓超(1873-1929)比胡適大十八歲，胡適小時候受梁影響至鉅；但在胡適留美歸來之後，卻時時以新創見刺激梁啓超寫出許多精彩的著作，包括「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在內。



與梁啓超成忘年之交的胡適

胡適和梁啓超是忘年之交，梁啓超對胡適的著作常有坦白的批評；胡適發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後，梁啓超批評他「文不對題」，自己也開了一張書單。



王安石的「有爲」

胡適很推崇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胡適認爲「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爲』來替代『無爲』」；這兩句王安石的詩，是胡適生前最愛題贈給別人的詩句。

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

王荊公詩

胡適



胡適作品集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文存

第二集第一卷

胡適作品集⑦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一卷）

作　者／胡　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代表號）

總經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10樓2室　**電話**/394-3393

内文印刷／

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板橋市仁化街84號　**電話**/249-1836

封面印製／

萬興印刷製版公司・中和市景新街140-4號 1 樓　**電話**/253-3081

1986年 4 月10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K.$25.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經銷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3-805705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卽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

論；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爲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

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胡適作品集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目錄

序

《文存》的第一集，是十年十一月結集的。三年以來，又積下了五十萬字的雜文。亞東圖書館裏的朋友們幫我編集起來，成爲《文存》第二集。汪原放先生特爲此事遠道跑來北京，住在我家裏逼着我編定目錄；章希呂、余昌之兩先生擔任校對：這都是我應該道謝的。

我本想分作四卷，第一二卷爲講學之文，第三卷爲論政治之文，第四卷爲雜文。但因爲文字的長短，每册的厚薄，竟不能嚴格地拘守這個區分。有幾篇稍長的講學文字，如「崔述的年譜」，如「戴東原的哲學」，因未完篇，故不曾收入。因此，卷一與卷四不免有截長補短，互相移動的痕跡。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遷就朋友的主張，勉强編入的。「這一週」的短評，本無保存的價値。因爲有朋友說，這種體裁在今日或以後的輿論界也許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暫時留在這裏。

卷二裏「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兩篇，原是爲《申報》五十年紀

念册做的；申報館另出有單行本。申報館許我重印的好意是我很感謝的。

這一集裏也收有幾篇三年前的舊作，也有一兩篇是不曾發表過的。「費經虞與費密」一篇，是用舊稿「記費密的學說」，從頭改作，比舊稿增多不止十倍了。

《文存》第一集出版時，我曾說：

> 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做的文章，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

我現在拿這兩點來審查這第二集，覺得還不至於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所以我還用這兩句話來介紹這幾册文字給我的讀者罷。

十三・九・二十三　胡適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近來年，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爲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我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爲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爲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爲，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

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明末到於今，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　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眞僞的考訂。考訂眞僞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　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爲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爲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爲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刋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着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鈎沉》《小學鈎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　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爲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　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工。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

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　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淸儒有鑑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眞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章學誠，一七三八至一八〇〇年），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猶指秫黍以爲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爲。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註》《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僞《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啓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爲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瀰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它，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它，把它從《禮記》裏抬出來尊爲四書之一，推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

佛書的眼鏡，望着《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者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爲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着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着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一、擴大研究的範圍。

二、注意系統的整理。

三、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

「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爲「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爲妥當；因爲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它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淸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爲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它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它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它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爲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

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它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它們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淸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　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　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

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校讎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敍佈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鈔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爲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偌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

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賬式的整理　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賬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一、結束從前的成績，二、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賬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賬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賬，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歎」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又可以明白結賬式的整理

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爲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淸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爲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吧？我們以爲，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賬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 **異文的校勘**　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 **古韻的考究**　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 **訓詁**　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 **見解**（序說）　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僞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謎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賬裏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

《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爲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㈤國際交通史
㈥思想學術史
㈦宗教史
㈧文藝史
㈨風俗史
㈩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着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呢？　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 Karlgren，

如 Baron von Staë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途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十二・一月

發起《讀書雜志》的緣起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子王引之兩個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志，叫做《讀書雜志》。這個雜志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想像那兩位白髮的學者——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六十多歲——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注那許多的古書來嘉惠我們，那一副「白髮校書圖」還不够使我們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個人，現在發起這個新的《讀書雜志》，希望各位愛讀書的朋友們把讀書研究的結果，藉它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

十·二·二十二

王莽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駡，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王莽於西曆紀元九年建國，那年他就下詔曰：

>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于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此等處皆可以補史傳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

專殺之威」的主張）。……漢氏減輕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詔須看「王莽傳」）

「莽傳」說：「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食貨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當日施行時自然有大困難。到了西曆十二年，中郎區博諫莽曰：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傳」）

莽知民愁，乃下書曰：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曆十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設「六筦之令」。「筦」字「食貨志」作「斡」，即是「歸國家管理」之意。六筦是：

一、鹽，二、酒，三、鐵，四、名山大澤，五、錢布銅冶（今本錢作鐵，今依錢大昭校，據閩本），六、五均賒貸。

「食貨志」記諸筦，有兩次詔令的原文。「莽傳」亦有兩次，一在西十年，一在西十七年。「食貨志」第一詔當是十年的：

夫《周禮》有賒貸（此指「泉府」之職），《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並兼也。

「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兩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卽泉府）丞一人。」此時似尚未明定「六筦」之數，諸「斡」次第擧行。凡屬於國有富源的，辦法如下：

「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鉛）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于〕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這不是國家自辦，乃是歸國家管理；凡做此項事業的，須呈報（「占」）于司市錢府。營業所得，國家要抽「所得稅」。故「食貨志」說：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有不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于〕縣官一歲。

抽所得移竟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確。況且科罰條文內說「盡沒入所采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稅

只限於「諸取衆物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者」。「莽傳」也只說「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可以互證。

「食貨志」說酤酒的辦法最詳細：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並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酢漿也）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五均之制，「食貨志」也說的詳細：

一、**市平**（平均的物價）「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

二、**收滯貨**　「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于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三、**平市**　「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所收不讎之物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于〕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四、賒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五、貸本　「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而〕受息，毋過歲什一。」「莽傳」作「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

這些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的目的都是「均衆庶，仰並兼」。但當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畫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政府裏的書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經驗的商人，故「食貨志」又說：

> 義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俞病。

到了西十七年，王莽又下詔曰：

>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言之好；鐵，農田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給以瞻；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戸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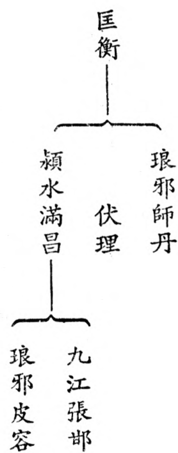
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筦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們看這一詔，可以知道當日的政治家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義，六筦都是民間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勢必不能；若讓少數富賈豪民去做，貧民必致受他們的剝削。社會主義者所以主張把這種「公共用具」一切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個意思，卽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無可疑的了。

西二十一年，南郡秦豐，平原女子遲昭平各聚兵作亂，莽召羣臣問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他說：

……國師嘉信公（劉歆）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這幾個重要人物，除了劉歆之外，幾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孫祿明白提出，我們竟無從知道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孫陽，已不可考。張邯見於《漢書》「儒林傳」（八十八）之「后蒼傳」下。后蒼通詩禮，傳匡衡、翼奉、蕭望之，匡衡的傳經表如下：



按「莽傳」，滿昌爲莽太子講詩。又按「后蒼傳」，張邯與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魯匡見於《後漢書》「魯恭傳」（五十五），「恭，扶風平陵人也。……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食貨志」說：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取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即十年之詔）。……羲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筦在縣官。唯酒酤獨未筦。……《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

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餘見上）

這種穿鑿附會，絕像王莽時代的經學家。「莽傳」又說，公孫祿請誅數子之後，

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

大概酒筦是魯匡的計畫，其餘則劉歆等人的合作，未必是魯匡一人「所獨造」了。西二十二年，四方盜賊並起，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此事竟無下文，似乎終莽之世，這些政策不曾廢除。再過一年，他就死了。

「食貨志」說：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

「莽傳」說：

>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擥衆事。……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爲」，要「均衆庶，抑幷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漸臺上，他的頭被一個商人杜吳斫去，尸首被軍人分裂，「支節肌骨臠分」！而二千年來，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十一・九・三

記李覯的學說

——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讀《直講李先生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用明成化刊本景印，凡「年譜」一卷，「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共八冊。）

李覯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膽，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的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然而《宋元學案》裏竟不給他立學案，只附在范仲淹的學案內，全祖望本想爲他立「盱江學案」，後來不知怎樣，終於把他附在「高平學案」內。這幾百年來，大家竟不知道有李覯這一位大學者了！我從前讀北宋和尙契嵩的文集，見他特別注意李覯的言論，當時我就很想研究他的著作。近來讀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學派的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兩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因此，我現在熱心的介紹他給國中研究思想史的人們。

一、事蹟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死於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五十一。

十三歲（一〇二一），是年王安石生。

二十三歲（一〇三一），作《潛書》十五篇。

二十四歲（一〇三二），作《禮論》七篇。

二十八歲（一〇三六），作《明堂定制圖》並序、《平土書》。是年入京。

二十九歲（一〇三七），往鄱陽謁范仲淹。

三十歲（一〇三八），作《廣潛書》十五篇。

三十一歲（一〇三九），作《富國彊兵安民》三十策。

三十三歲（一〇四一），應制科試入京。明年試不第。歸。

三十五歲（一〇四三），作《慶歷民言》三十篇，《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在南城主郡學，學者來者數百人。

三十七歲（一〇四五），余靖薦先生於朝，略云，「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

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

三十九歲（一〇四七），作《禮論後語》《刪定劉牧易圖序》。按「序」云「嘗作《易論》十三篇」，是《易論》作於此年之前。

四十一歲（一〇四九），范仲淹薦於朝，略云，「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

四十二歲（一〇五〇），范仲淹再薦於朝，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

四十四歲（一〇五二），范仲淹卒。是年王安石三十一歲。集《皇祐續稿》八卷。刊行《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四十五歲（一〇五三），著《常語》三卷。明年作「常語後序」。

四十九歲（一〇五七），國子監奏乞差李覯充太學說書。

五十歲（一〇五八），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五十一歲（一〇五九），權同管勾太學；因胡瑗病，故有是命。是年胡瑗卒；八月，先生亦卒。

集後附「門人錄」，可考者三十八人。門人陳次公作墓誌，言門人登錄者千有餘人，此蓋併合太學生徒而言耳。

二、學說

李覯是一個實用主義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樂利主義。所以他的「原文」篇說：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

因爲他注重在功利，故他大膽的提倡霸國與强國。他「寄上范參政書」有云：

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

又《常語》上云：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衞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又《常語》下云：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

這一段駁向來區別王霸的謬論，非常明白痛快。他的結論是：

所謂王道，……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這是說：天子安天下，便是王道；諸侯擁護中央政府而安天下，便是霸道。眞的區別只是立功的人的地位不同，並不是義與利的分別，也不是純粹與駁雜的區別。

因爲他注重富國利民，故他有《富國强兵安民》三十策，有《平土書》，有《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

他的《富國策》開端的幾句話可以引來作他的理財論的引子：

>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敎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羣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爲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

這是他的根本主張，也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根本主張，故最可注意。

他的《周禮致太平論》把一部《周禮》的材料，整理出來，分作「內治」「國用」「軍衛」「刑禁」「官人」「敎道」六類。這樣分類，頗有點像近人做的《周禮政要》一類的書；雖是講

《周禮》，其實是談當時的政治。這六類之中，「國用」十六篇最爲重要，因爲他的許多主張都是和王安石一致的。我們可以說，李覯是熙寧、元豐新法的哲學家，他的政治哲學是新法的學理的背景。我且舉他的重要主張如下：

一、國用出入須有定制　「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國用」一）

二、天子無私財　「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國用」二）

三、「人各有事，事各有功」　「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于事；取有利于國家，然後可也。……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除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這個「不作工不配吃飯」的主義原來不是俄國的波雪維克的新發明！（「國用」三。參看七）

四、「人無遺力，地無遺利」 他根據《周禮》（大司徒，遂人）主張「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萊謂休不耕者），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猶作惰游，況邑居乎？沃壤猶爲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略爲限。不可察也。」（「國用」四。參看七）

五、應調查民財 《周禮》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政令。」（逆謂鉤考）「恐其羣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國用」八）

六、平準（此卽後來王安石所謂「均輸」） 《周禮》有「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及「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二事。他因主張仿桑弘羊的辦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他的理由是：「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刧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爲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國用」九）

七、泉府之制　此卽王安石「青苗錢」所本，故我詳引李覯的議論於此。《周禮》本文云：

>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鄭司農說，「抵，故賈也。」鄭玄說，「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此處當從鄭司農說。因爲從原價，不取利，故須保證，不願買者拿去牟利。國服二字亦有兩說：鄭司農說，「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玄說，「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李覯與王安石皆從鄭玄說。李覯說：

>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

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強，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國用」十一）

八、均役使　《周禮》役民之法甚平均，免役只限於「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李覯說，「君子之于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國用」十五）王安石後來行的「免役錢」，亦是這個道理。宋代「差役」之法，當時人大都知其不便。故雖反對王安石最力的人，如蘇軾、范純仁等，皆反對司馬光推翻此法。

李覯不但把一部《周禮》做成一部有系統的政治學說，他還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實用的學說。他的《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刪定易圖序論》）。第一篇論《易》的爲君之道，第二篇論任官，第三篇論爲臣之道，第四篇論治身之道及治家之

道，第五篇論遇人，第六篇論動而無悔之道，第七篇論應變，第八篇論常與權，第九篇論愼禍福，……

他在《易論》第一篇裏說：

聖人作《易》，本以敎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爲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爲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爲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萬事之理，猶輻之于輪，靡不在其中矣。

他最恨那些「晝讀夜思，疲心于無用之說」的《易》學，故他對於當時最風行的劉牧的《易圖》（牧字長民，是范仲淹、孫復的門人，受《易》於范諤昌，范受之於許堅，許受之於种放。）極不滿意。牧有五十五圖，李覯刪存三圖——河圖，洛書，八卦。他保留這三圖，固是不能十分徹底。但他的《刪定易圖序論》確然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議論。其第六篇尤爲有精采，今錄其末段：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

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爲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

這幾句話不甚明白，須看下文始知他的用意只是要人注意性命的外面的表現──「善」。他不要我們空談那不可捉摸的性命。他下文說：

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敎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爲天之所爲也。

此論極重要。他所說的「命」只是一種「本來應該如此」的道理。但這種命須要有聖人「制民之法，足民之用」，然後可以表現出來，故說「非聖人則命不行」。他所說的「性」只是一塊「可以如此，可以如彼」的質料。但這種質料須要有敎育禮法的制裁，然後可爲成材。性命都是天然

的，但都全靠人力，方能有成，聖人只是那些用人力做到天然的可能性的人，故說「聖人爲天之所爲」。他下文說：

> 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所謂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擧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疑衆，殺。」爲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這種完全注重人事的哲學，眞是李覯的特色！當時的思想界幾乎全是一個道士的世界。天書的笑柄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陳摶、种放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時候。孫復爲北方大儒，范仲淹爲南方大師，而他們的弟子中乃有劉牧、周敦頤一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歐陽修大膽疑古於前；李覯大膽主張功利，主張人事，比歐陽修更進一步；後來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體的表現了！

*

李覯的功利主義和人事主義並不是要反乎自然，其實還是要根據自然。禮制法度都是人爲的謀樂利的工具，但不是違背人情的天然趨勢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謀天然的本能的正當發展的唯一法門。禮制若違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說「聖人爲天之所爲」，卽是此意。他很反對當時儒者的反人情論。例如胡瑗作「原禮篇」有云：

> 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

李覯駁他道：

> 覯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爲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爲功，師欲以爲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禮爲能順人情，豈嘗勉強之哉？
>
> 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爲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爲君臣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

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辜，爲離散。嚮之所謂情者，雖積于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于山藪，鳥之于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爲罪辜，爲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于圈，鳥之于紲，魚之于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與胡先生書」）

他的《禮論》說的更詳細。《禮論》一說：

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爲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爲飲食，藝麻爲布，繰絲爲帛，以爲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顚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膇之疾，於是爲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爲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斲木，或爲陶瓦脂膠丹漆，以爲器

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爲之婚姻以正夫婦，爲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爲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爲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爲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於是爲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爲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爲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

最可注意的是他講禮的範圍極大，包括樂刑政及仁義智信七項。他說：

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

他說明這一層如下：

「禮既備」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

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于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之類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他這種分類法，頗有一種很正當的見解。古人把仁義禮智信看作五件平等的東西，如漢人把木金火水土分配五常，是很沒有道理的。禮是很具體的東西，如何能與那四個抽象名詞並列？故李覯說：

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

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禮論》五）

李覯的大貢獻是把五常之中最具體的一項提出來，特別注重。他說的禮不是那懸空闊大的虛談，乃是那根據於人的性欲上的法制。他說，「禮者，先王之法制也」。用「法制」來解釋「

禮」，有兩層好處：第一，法制是應用的；第二，法制是在外面的，是具體的制度。這樣一來，可以掃除許多無稽的玄談。故他設爲問答的話，說明這一點：

> 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
>
> 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爲陳熟，以虛辭爲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禮論》六）

這種議論自然引起當時人的反動。他的《禮論》成書後十五年，有章望之（名表民）作文駁他道：

> 率天下之人爲禮，不求諸內而競諸外。人之內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禮論》後語引）

這個駁議最可指出李覯的思想的特點。他的特點就在這個「外」字上。他說，「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單有內而沒有外面的表現，是沒有用的。故他的答覆是：

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爲內，猶飢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爲外，猶冠弁之存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內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內者，必出諸外；有諸外者，必由於內。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僞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飢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禮論》後語）

他不承認內外的區別，故說，連衣冠也都是根據於人的性欲的需要的，故是「內」的。他又說「天下之善，無非內者」。這句話便是打破一切重內輕外的成見。因爲一切善都是內的，故他明白主張法制的重要。他說，「有諸內者，必出諸外。」單注重內而不注重外面表現的制度，不是儒家的性理空談，便是禪家與道士的「內功」了。他在《禮論》四中說，「性畜於內，怯行於外。」這是李覯的一大主張。後來王安石的新法便是想從外面的制度上做一番救世的工夫。後來王安石一系與司馬光、程頤一系的勢不兩立的競爭，從哲學史上看來，仍舊是一個主外與主內之爭。王安石一系究竟失敗了，故這八百年的思想史仍舊是主內派的勝利史。

李覯是一個排佛教最力的人，他的極力提倡禮制，也是想用儒家的禮敎來代替佛道的儀式。他說：

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敎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敎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姓黃）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敎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答黃漢傑書」，書中所引乃「景德寺重修大殿記」。）

這是當時少數學者公認的論調。如歐陽修《本論》中下兩篇（著作的時代與李覯的「景德寺記」相近）卽是這個意思。歐陽修說：

>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本論》中）

又說：

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本論》下）

李覯的主張完全與此相同，故他極力說明禮制是順於人情的，是適用的。他要使儒家相傳的禮教，——「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一一回復他們舊有的勢力，範圍社會的一切生活，滿足「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的需要。這是中國近世哲學的中心問題。李覯說：

儒者詬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韙，而外彊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於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

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於淫僻，恤乎罪戾，欲問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遊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歟？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參禪，某院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前耶？（「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這一段說的最感慨。釋氏所以大行於世，只爲他們「善自大其法」，故儒者的問題也是「如何自大其法」。釋氏能使人「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於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故儒家的問題也是如何能使人「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于儒；民用是信，事用是立」。

懂得這個中心問題，方才可以了解近世哲學。李覯、歐陽修、王安石一班人想從禮樂刑政一方面來做那「自大其教」的事業；程頤、朱熹一班人想從身心性命一方面來做那「自大其教」的事業。李覯是最能代表這種精神的人。他說：

>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原注，祥吏反）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悲夫！（《潛書》）

他在他的「袁州學記」內，很痛切的提出他的教育宗旨：

> 今代遺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這是他「自大其敎」的精神。

三、餘論

李覯和王安石的關係，可以證明嗎？

本書「門人錄」引《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鄧溫伯即是鄧潤甫，潤甫先以字行。《宋史》四百三十二，「李覯傳」末有云：「門人鄧潤甫，熙甯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並《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鄧潤甫亦是建昌人，與李覯同鄉。王安石用他爲編修中書戶房事，後改知諫院，知制誥；後升爲御史中丞。鄧潤甫是王安石的一員健將，他們在熙寧變法時代特別奏上李覯的遺著，可見李覯在新法一派人的眼裏，確是同調，確是一個前輩的大師。後來哲宗親政時，鄧潤甫首先陳「武王能繼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遂開「紹述」的運動。紹聖元年，潤甫作尙書右丞。

歐陽修生於廬陵，屬吉州，王安石生於臨川，屬撫州；曾氏弟兄，鄧潤甫，和李覯同屬建昌軍。這一班人同屬北宋之西路，南宋之隆興府，今之江西省。

費經虞與費密

——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讀費密的《弘道書》，三卷，成都唐氏怡蘭堂刻的《費氏遺書》本，民國九年刻成。

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界裏，有兩個很可代表時代的人物，而三百年來很少人知道或表章的：費經虞和他的兒子費密。乾嘉之際，章學誠得讀費密的兒子費錫璜的《貫道堂文集》，因做了一篇很詳細的提要（見浙江圖書館排本《章氏遺書》及吳興劉氏刻本《章氏遺書》）。但章學誠雖然能賞識費氏的家學，終有點懷疑；他疑心費錫璜說的太誇張了。清朝晚年，戴望以顏李學派的信徒的資格，來作「費舍人別傳」（見《謫麐堂集》）；他的賞識應該比章學誠更深一層了。但他的敍述太簡單了，終不能使人知道費氏家學的眞相。直到近年（一九二〇）成都唐鴻學先生刻《費氏遺書》三種，——《弘道書》《荒書》《燕峯詩鈔》——世間始有人知道費密的思想確有很可表章的價值，確

可以算是清初思想界代表之一個。我在幾年前曾作一篇「記費密的學說」，是匆匆做的筆記，被朋友搶去發表了。近年重讀《弘道書》，覺得費氏父子的思想應該有一篇更詳細的研究，故重做了這一篇。前年又承江都周紹均先生替我借得費氏的族譜，添了許多傳記的材料。現在我把這些材料附錄在這裏，使愛敬費氏的人可以參考。

一、費經虞家傳（《江都費氏族譜》六）

先名曰經野，入學時名經緯，中式時乃名經虞。字仲若，號鮮民。雲衢公（字良輔，名嘉誥，萬曆二十三年乙巳明經，三十九年辛亥選授四川大竹縣訓導，四十二年甲寅卒於官，年六十三。）第三子（兄弟四人，長經國，次經世，次經虞，次經濟，姊妹四人），母鄧氏。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二月十七日生。

丁巳，補邑庠生。

天啓三年癸亥，進廩膳。

崇禎九年丙子，中副卷。十二年己卯，中式五十四名。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五日選授雲南昆明縣令。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

丙戌年（一六四六），因成都奇禍，家口未知安否，欲歸里訪問，屢次辭官未得。按院羅國瓛

加陞爲雲南府同知。

丁亥年三月，兵逼滇省；力辭，方得許。四月初三日，率次子燕峯公（密）及諸僕啓行，渡金沙江，抵建昌衞。

戊子，會妻曹氏於黎州。四月至雅州。

己丑，移家至榮經縣之楊村。住二年。

壬辰，正月，至崇慶州國寺村，住兩月餘。四月歸新繁。十月移家居彭縣野鴨池。十一月，移彭縣鳳皇山，與諸親謀遠行。十二月過什邡綿竹安縣；除夕至綿州。

癸巳二月初七日至蒲家村；三月十八日至圓山砦陝西沔砦。

甲午正月九日，移蕭家砦，共住三年十月。

丁酉（一六五七）十一月二十五日，因楊鳴九公（父嘉詒元配楊氏，父名端雲；疑鳴九是母族之人。）歸揚之便，闔家啓行。十二月六日至漢口，戊戌年二月三日抵揚州。

己亥春，聞海寇消息日急，至六月十七日方得出揚州城，登舟至喬墅。……十月十八日至泰州。

庚子三月二十日復歸揚州。

辛丑三月，燕峯同張曲山（乙未進士）往廣東。閏七月，公至蘇州。蘇州又有圍城之警，因匿

居于施家浜顧廚子家。

八月，燕峯自廣東歸揚；十二月十四，往蘇州迎公。二十二日同回揚州。二十三日至泰州，住過壬寅年、癸卯年。

甲辰十二月四日，自泰州復移至揚州。

戊申九月，到塘頭，移家入戈莊宅。

己酉八月十八日，燕峯往平鄉縣，趙公（諱弼字子匡）任中抽豐。

庚戌七月，水淹戈莊宅。十八日往揚州。

康熙十年辛亥（一六七一）正月二日申時，卒於揚州。……

門人私諡曰孝貞先生。

二、節錄費密的家傳（同上）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

鮮民公次子，母王氏。（父名以廉，彭縣野鴨池人，蜀王府典儀官。）

明天啓五年乙丑（一六二五）七月二十三日子時生。……

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四月，移居野田。

康熙辛巳（一七〇一）九月七日未時，卒于家，年七十有七。葬野田鮮民公墓西一塚，有碑，東北向。門人私謚曰中文先生。……

生二子，長錫琮，次錫璜；二女。……

〔適按〕

戴望作「費舍人別傳」，說費密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章學誠「書《貫道堂文集》後」也說費密「生天啓六年（丙寅，一六二六），卒康熙三十八年。」而《族譜》與《新繁志》傳皆作卒於四十年辛巳。章戴雖然同根據於費密之子錫璜的書，其實不足憑信。費密若生於天啓六年，至康熙三十八年只有七十四歲，其誤可見。況《弘道書》首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張含章的序，有「吾師……今七十一矣」之語。足證費密生於天啓五年之不誤。兒子記父親生死之年，尚不可輕信，這可見史學上「旁證」的重要了。

十三・七・二十九　在大連

三、費密傳（《新繁縣志》「人物志・孝弟」）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父經虞為講《通鑑》盤古氏相傳為首出御世之君（適按，《通鑑》無此文），遽問曰，「盤古以前？」曰，「鴻荒未闢。」又問「鴻

荒以前?」經虞呵之，然心奇之。……

崇禎甲申（一六四四），流賊張獻忠亂蜀；密年二十，爲書上巡按御史劉之渤，言四事：練兵一，守險二，蜀王出軍餉三，停徵十六、十七兩年錢糧四。倉卒未果行。賊遂陷成都。密展轉遷徙，得不遇害。

丙戌，入什邡縣高定關，倡義，爲砦拒賊，賊乘間刼營。設伏待之，不敢犯，一方以安。時經虞仕滇，以家遭大亂，屢乞休。密聞之，遂隻身從兵戈蠻峒中入滇。丁亥，奉父入建昌衞。十月，至黎州省母；十二月，復入建昌；過相嶺，被凹者蠻擄去。明年戊子，贖歸。

會楊展鎭嘉定關，聞密名，遣人致聘焉。因說展屯田于雅州龍門山；復于青神江口，命人沉水得張獻忠棄金，爲民間買牛，餘悉給諸鎭，得久與賊相持。

十月，同展子璟新復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入敍州府，遇督師呂大器，署爲中書舍人（故戴望稱費舍人）。內江范文熒見密文，大驚曰：「始以吾此度有經濟才，不知吾此度詞客也!」

是時密與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詩文雄西南，稱三子。

己丑秋，楊展爲降將武大定袁韜所害，密與璟新整師復仇，與賊戰，身自擐甲。時營在峨眉，裨將來某與花溪民有隙，詐稱花溪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璟新。璟新遽署檄討之，密力爭，……乃止。率殘卒復與璟新屯田于瓦屋山。

庚寅七月，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賊兵所刼；十月，又爲杜漢良掠送大定營中，幾被害。十二月，乘間還楊村。

辛卯四月，歸新繁，舊宅皆爲灰燼。

明年癸巳（一六五二）二月，至陝西沔縣，遂家焉。

密留楊展父子幕最久，所至屯田，爲持久計。而天命人事已改，是以大功不就。

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爲《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丙申（一六五六），與通醉（僧名？）論禪，四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厲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況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餘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爲二，如履在牀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學矣。

丁酉（一六五七）十月，攜家出沔漢。戊戌春，至揚州；聞常熟錢尙書謙益以古文名天下，乃上書錢公；錢公得書大驚，與論詩于芙蓉莊，指密「北征」詩，歎曰，「此必傳之作也」。

時王司寇士禎司李揚州，見密古詩，以爲絕倫，而尤愛近體「白馬岩中出，黃牛壁上耕」「鳥聲下楊柳，人語出菰蒲」「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等句。當時咸謂知言。

辛亥（一六七一），居父喪，悉遵古禮，冠衰皆仿古自製。三原孫枝蔚見之，自謂弗及。服闋（一六七三），以父遺命，往事孫徵君奇逢。一日，與論朱陸異同，進言漢唐諸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沒。徵君大以爲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辭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爲贈。

丙辰（一六七六）冬，聞孫徵君卒，哭于泰州圓通菴，設主受弔；冠細麻，加粗麻一道，橫于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主出菴，心喪未去懷也。

丁巳，入山東提督將軍柯永蓁幕。會舉博學鴻詞，永蓁屢欲論薦；力辭，乃止。

乙丑，修《明史》，頗採舊臣遺佚者。密塗泥入都，奉其父行狀，入史館，下拜，涕泣沾襟袖。在館諸人皆爲感動。

己巳，大病，尋愈；乃自定生平所著諸書。

辛巳（一七〇一）六月，病下痢，遂不起，年七十有七。門人私謚中文先生。

密少遭喪亂，經歷兵戈，中年遷徙異國，足迹偏天下，晚年窮困，閉戶著書，篤守古經，倡明聖學，以教及門。嘗謂子錫琮、錫瓚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爲無用之學。天性和平，與人無忤；終身未嘗言人過失；有機相向者，淡然處之。村居數十年，著書甚多。

自宋人謂周程接孔孟，二千年儒者盡黜，無一聞道者，密嘗爲之悲慟，乃上考古經與歷代

正史，旁採羣書，作《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

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此下敍諸篇目，與戴望所作《傳》同，故不錄。）……《聖門舊章》六種，共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卷，《詩鈔》二十卷。外集三十二種，百二十二卷。藏于家。（《江都志》《弘道書》及《舊章》卷數同此。但又云，「《中旨定論》以及《歷代貢舉》二十二種，共九十卷，《詩古文詞》二十二卷。」）

密生平精于古注疏，謂古注言簡味深，平實可用。後儒卽更新變易，卒不能過。古經之文，專賴此書。變易經文，各自爲說，勢將不止，深爲可懼。

次則尤愛《史記》，枕籍其中者八年；於諸子則熟《南華》，於八家則愛昌黎。……

四、費氏的書目（《新繁志》「藝文」）

費經虞：四書廣訓一卷　　毛詩廣義三十卷

字學十卷　　古韻拾遺一卷

雅倫一卷

《揚州府志》作

毛詩廣義二十卷　　四書字義一卷
雅倫三十卷　　臨池懿訓三卷
注周易參同契一卷
《江都縣志》則作
劍閣芳華集二十卷　　雅倫三十卷

費　密：中傳正紀百二十卷　　弘道書十卷（今本三卷）
聖門舊章二十四卷　　文集二十卷
詩鈔二十卷　　河洛古文一卷
尚書說一卷　　周禮注論一卷
二南偶說一卷　　甕錄一卷
中庸大學古文一卷　　中庸大學駁論一卷
太極圖記八卷　　聖門學脈中旨錄一卷
古史正十卷　　史記補箋四卷
歷代紀年四卷　　四禮補錄十卷
古文旨要二卷　　蠶此遺錄二卷

答箸歸來晚暇記四卷
奢亂紀略一卷
歷代貢舉九十卷
題跋六卷
詩餘二卷
費氏家訓四卷
長沙發揮一卷
金匱本草六卷
集外雜存八卷
雅倫二十六卷
中旨正錄二卷
中旨統論二卷
歷代貢舉合議二卷
老農記事二卷
全唐詩選十卷

費氏荒書四卷（今本一卷）
二氏論一卷
尺牘六卷
雜著二卷
祀先儀禮一卷
王氏疹論一卷
傷寒口義二卷
補劍閣芳華集二十卷
中旨定論一卷
中旨辨錄二卷
中旨申惑二卷
朝野爭論二卷
天涯知己錄一卷

以下各見本傳

費錫琮：家庭偕詠集　白雀樓集

費錫璜：貫道堂文集　掣鯨堂詩鈔

五、孫奇逢給費密的手書（皆載《費氏族譜》）

一

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學京兆，得聞其家學。……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

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常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不盡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隨人轉移爾。（癸丑春中）

二

此度留秉山草堂旬餘矣。素不聞其師事者何人，友事者何人。今閱其著書，聞其持論，若久在江村侍講席者。其論朱陸異同，陽明之效諍論于紫陽，皆確有所見，不隨人口吻。至論漢唐諸儒有功于聖人，且有功于宋人，可謂漢儒知己。然此皆往事，猶有人論說。其論目前人，謂某非

諫官，持論亦不必太激；某某當國而令小人潰決至此，亦未免不學無術：此皆予在江村四十年前所論說，此度若習聞之。此度既能世其家學，自能光大師說。老夫拭目望之矣。啓泰氏又書。

三

王文成公之學，鄒文莊公得之，傳其子昌泉公，諱美。先大父敬所公，諱臣，與昌泉公同學嘉靖辛酉京兆榜，得聞其家學，暨其著述，以授先季父司訓公，諱丕基。不肖逢奉父命從受學，尤得吾友鹿忠節，諱善繼，切磋之力。成都費密事予山中，因述付之。癸丑春日。

四

從來聚首之難！然同此覆載照臨，猶比屋而居也。此度勉之！臨路手書。啓泰。

六、費密答李塨的書（載《恕谷年譜》）

費氏家學與北方顏李學派有無關係，這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李塨的《恕谷年譜》卷二，記康熙戊辰（一六八八），李塨三十歲時，費密六十四歲時，李塨寓書費燕峯論學。自註云，「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費氏復書亦載此卷中，今附錄于此。

是時李塨未曾到南方，已知費氏之名，可見費氏在當日的名聞不小。後來康熙甲戌（一六九四），李塨三十六歲時，費氏又有論學書給李氏，今不存。次年（一六九五），李塨南遊，「過揚州，拜蔡瞻

岷廷治（刻本訛作蔡瞻治岷，今正。）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滋衡（錫璜）來謁。」（《恕谷年譜》卷二）那時費密已七十一歲了。

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者〕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樵）又以爲與洙泗不同，著《淳熙闢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諍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曆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卽入于致〔良〕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卽物窮理，承譌旣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顚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

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玆以後，弘儒碩識必剖諍滿世，甯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七、費氏父子的學說

一、費氏家學與道統論

費氏父子都長於歷史知識，故他們第一步便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道統說始於韓愈，他說「堯以是傳之舜，……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時，蔡京極推崇王安石，說他「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與孟軻相上下。」程顥死時，程頤作他的行狀，說他是孟軻後一人。至朱熹作「三先生祠記」，他說：

>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學。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于世。（此「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淳熙五年。參觀同類的「祠記」甚多。）

又他的《中庸集解》序說：

> 《中庸》之書，……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乾道癸巳）

又《大學章句》序：

>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淳熙己酉）

又《中庸章句》序：

> 及其（孟氏）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同上年）

這叫做「道統論」。這種道統論一日不去，則宋明理學的尊嚴一日不破。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只是一種因襲的道統論，他說上古的道統（宗傳）是：

（元）羲皇　（亨）堯舜　（利）禹湯　（貞）文武周公

中古的統是：

近古的統是：（元）孔子　（亨）顏曾　（利）子思　（貞）孟子

（元）周子　（亨）程張　（利）朱子　（貞）王子

這竟是海智爾的哲學史觀了！故他的「宗傳」以周，大程，小程，張，邵，朱，陸，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爲正統；餘人自漢至明皆爲附考。他的特別貢獻只在把王守仁作爲程朱的嫡派。此外全都是因襲的，並且是更壞的（因為更詳密的）道統論。

費氏父子根本否認這種道統論，故說：

> 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于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然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弘道書》上，一）

又說：

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顚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歟？（上，四）

這話何等痛快！

他們父子因爲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故也提出一種他們認爲正當的道統論。他們以爲最古政敎不分，君師合一，政卽是道。後來孔子不得位，故君師分爲二，故帝王將相傳治統，而師儒弟子傳道脈。但所謂「道」仍是古昔的政教禮制，故「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上，四）

他主張：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上，二）

他把這個意思列爲「天子統道表」：

二帝三王——孔子——歷代帝王統道（君師之尊，治教所本。）——公卿輔行道統
（君師合一）　　（師）　　　　　　　　　　　　　　　　——師儒講傳道脈

這個表，初看去似乎很淺陋。但我們要進一步去尋它的眞意義。費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認那「一二人靜坐而得」的不傳的絕學。他的根據是歷史的：他只說，古往今來的一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別無所謂道，也別無所謂道統。簡單一句話，事業即是道，事業史即是道統。他們父子說：

> 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爲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爲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爲道德，以事業爲伯術，則後儒竄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上，十）

這個意思，他們也列爲一表：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下，二十八）

〔儒〕

君臣將相行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興敎，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所〕遵守：此爲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僻之儔行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靜坐相傳爲專養心性。

〔佛氏〕

其徒靜坐相傳爲專悟心性。

這種見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這是大家口頭都會說的區別。但費氏父子提出的區別，說的更痛快。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業，二氏是山林幽隱的道；我

們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來做我們的城市生活的事業。第二，儒家的道的內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農工商所遵守的實事實用；二氏的道是少數閑人廢物的養心性與悟心性的工夫。我們不能叫士農工商都拋棄了他們的日用事業來做養心明性的工夫。

費氏家學所謂「道」，以「實事，中庸」為主。費密曾說：

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為性命怳忽之謂虛。（中，三十五）

他們認定這「通諸四民」「見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們極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說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荀子》「君道」）

但費氏父子的這種主張並非有意因襲前人，乃是從痛苦患難之中體驗出來的結論。費密說：

天下之治，羣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維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統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踰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爲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強之食。此時「心在腔子」「即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于救世？豈古經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經虞）平日論次，密老年益確信不疑也。（上，十五）

這一段自敍使我們看出時勢與學說的關係。清代學者所以羣趨於「反理學」的運動，也正是因爲靜坐致良知等等空談禁不起李自成、張獻忠一班人的試驗。費氏父子從亂離饑饉裏體驗出「道在於政治」的一個道理，故說，「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

費密的兒子費錫璜也能承家學，章學誠引他的《貫道堂文集》，有云：

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爲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爲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爲宮室，小不能爲輪轅，尚可以爲工乎？（劉刻《章氏遺書》八，頁二十）

這確是費氏的家學。他們把儒者看作一種「政治匠」，他的職業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

樣。他們菲薄理論，但用事功作標準，有時未免趨於極端，變成一種狹義的功利主義。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狹義的功利主義相同（參看我的《中國哲學史》上，頁三百十一）[1]，同爲事勢的產兒。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費氏家學的道統論。他們否認宋儒的道統論，他們認定儒術貴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談玄理，所以主張

> 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宋則議論為主，實事為末。）蓋人主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爲令：皆爲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爲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爲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上，五）

這種道統論，認事業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統，「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這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主要見解。其說與南宋的陳亮、葉適頗多相同，但陳亮雖大膽，說的尚不能有費氏父子這

樣的透徹明白；這大概是因爲費氏父子飽嘗了無政治的痛苦，體驗的深切，故主張也更老實透切了。

二、費氏論經學傳授源流

用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作道統，這是費氏父子的一種道統論。但他們另作一種「道脈譜」，敍七十子之後經學傳授的統系，表示儒學傳授並不曾中斷，並沒有宋儒說的「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事。這也是用歷史的事實來證明宋儒的道統論的虛妄。費密作「道脈譜論」（《弘道書》上），簡直是一篇儒學史論。他說：

> 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密深厚，幸獲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
>
> 漢興，……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共立學官。……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
>
> 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爲十二經；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絲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上，十七）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兩途，後人遂輕視漢魏以下的經師，以爲他們未聞大道；而道

統所寄，竟像眞在那些得千聖不傳之絕學的周程張朱諸人了。費氏父子不認政治史上三代以後全是「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也不認學術史上孟子以後儒學遂無傳人。他們用歷史事實來指出秦漢以下的傳經諸儒皆是七十子的眞正傳人。但從歷史上看來，漢儒尤爲重要。他們說：

然漢儒，冢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尚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未〕散失，三也。（上，二十七）

這不但代表費氏家學，並且代表清朝學者的「漢學運動」。這三層理由，其實只是一個理由，其實只是「去古未遠」四個字。清代學者所以推崇漢儒，只是因爲漢儒「去古未遠」，比較後代的宋明臆說爲更可信任。這個態度是歷史的態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於缺乏歷史的態度。他們的思想富於自由創造的成分，確有古人所不曾道過的；但他們不認這是他們自己的創見，卻偏要說這是古經的眞義。這並不是他們有心作僞欺人，只是缺乏歷史的眼光，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自己的創見誤認作千餘年前孔子、孟子的眞諦。後來他們的經說既成了學術思想界的無上權威，後人無法可以推翻他們。只有從歷史上立腳，指出宋明儒者生當千餘年之後，萬不能推翻那「去古未遠」的漢儒的權威。清代的漢學運動的眞意義在此；上文引的費密主張漢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層理

由，要算是這個運動的最明白的說明了。

人皆知漢學盛於清代，而很少人知道這個尊崇漢儒的運動在明朝中葉已很興盛。費氏父子富於歷史的興趣，自言他們的主張乃是宋元明三朝學者屢次主張的。在一處（上，二十二）他們列舉宋朝司馬光、歐陽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錢謙益等，凡一百零二人，都是主張漢唐諸儒可以繼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學者的話，更可以表示明朝中葉以後反理學、重漢學的傾向。如王鏊說：

>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掇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盡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

又引鄭曉的話：

> 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

又引歸有光的話：

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闢于有宋。

又引新安黃洪憲的話：

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于世，則扃鐍未啓，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四出；諸儒校讎未必無據焉，可盡訾哉？

這皆可表見尊崇漢儒的風氣不起於明末淸初。費密又敍他的直接淵源有四個人：

一、張朝瑞作《孔門傳道錄》，記七十子。

二、朱睦㮮作《授經圖》，列漢儒。

三、鄧元錫作《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

四、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

可廢。

因爲這四個人的書不大行於世，所以費經虞父子推廣這個意思，「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此書今不傳了，但據《新繁志》及《貫道堂集》所稱，「《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中傳」的意思卽是我們在上文說過的「通諸四民之謂中」。他們自己又下定義道：

> 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上，二十二）

據《新繁志》載的書目，費密還有《中旨定論》一卷，《中旨正錄》二卷，《中旨辨錄》二卷，《中旨統論》二卷，《中旨申惑》二卷。這可見「中」字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中心觀念。

「道脈譜」似是《中傳正紀》的一種圖表，「畫圖詳其世次，述傳授之宗系」。此譜亦不傳。但章學誠引《貫道堂集》，說費密「自推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大概此譜必有許多牽强附會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說他「妄誕不經」了。

「道脈譜論」的後半列擧五種反對的議論，並擧五種答覆。其第二辨云：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

費密駁他道：

……旣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與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

其第三辨云：

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只可言傳經，宋始傳道。

這是「道學」「儒林」分家的話。費密駁他道：

> 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闢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間，先王敎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于講道也。」有光眞不爲所惑哉？……即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廢也。……籩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之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爲毛血明水。遂盡削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

這一段的議論最公平。宋儒憑藉漢唐的經學，加上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參考的材料多了，他們對於古書的了解往往有確然超過漢唐之處。但他們爲中與儒敎起見，雖得力於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爲自尊其說起見，雖得力於漢唐而不能不壓倒漢唐。誰知他們的權威太大，終久要引起反宋學的運動，於是清儒雖皆得力於宋學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學。這眞是「一報還一報」。我們今日用純粹歷史的眼光看來，只看見古今一線相承，演化不息。漢儒去古未遠，保存得不少的古訓詁，有抱殘守闕之功，而他們的見解實在鄙陋的可笑。魏晉以後，經過低等民族的擾亂，印度

宗教的侵入，造成一個黑暗的中古時代，這也是不可諱的。在這個長期的中古時代裏，儒家實在不曾產出一個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兩個平凡的王通、韓愈來撐持門面。因爲中古儒家沒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後來儒者看不起中古時期，而有「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話頭。但平心看去，魏晉六朝的經師確也有繼續不斷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規模的結集，上結八代的經學，下開宋儒的經學。宋儒的理解能力來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經的基礎工具仍然是漢唐的注疏。不過宋儒生當禪宗大行之後，思想經過大解放，所以理解突過漢唐諸位學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組織偉大的系統。但這正是學問進化的自然現象，像堆柴一般，後來的應該在上面。費密說漢唐諸儒不妨等於「毛血明水」這是最公平的話。宋儒排斥漢唐，然而宋儒實在是毛公、鄭玄、王弼、王肅的嫡派兒孫。淸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也實在是朱熹、黃震、王應麟的嫡傳子孫（章學誠已能見及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宋學只是一種新漢學，而淸代的漢學其實只是一種新宋學！

費氏父子說：

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上，三十三）

這眞是歷史的眼光。不過他們生當宋學的反動時期，不免一筆抹殺宋儒的貢獻，不免過崇漢儒。這也正是費氏父子代表時代精神之處。他們說的「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也和顧炎武說的「經學卽理學」相同，也代表當日的學術界的一種大趨勢。

三、費氏的實用主義

費氏著的書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傳正紀》，而這書所代表的只是他們的新道統論，所以我們述他們的主張時也首先注重這一點。費氏的歷史的道統論旣說明了，我們現在可以硏究他們用歷史眼光去觀察儒家的學說所得的什麼結論。我們除去細節，只提出兩個方面：一是他們的實用主義，一是他們尙論古人的態度。

《新繁志》的「費密傳」曾述費密常對他的兒子說道：「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志傳又說他「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爲無用之學。」他的注重經驗事實，他的注重實用，是他的學說的特別色彩。他們從痛苦的經驗裏出來，深深地感覺宋明理學的空虛無用，所以主張一種實用主義。《新繁志》說費密壯年時（一六五六）曾在靜明寺和一班和尙學靜坐。坐到半月餘，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視物疑爲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

《弘道書》（下，二十）也說：

密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見道之源；使覩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這兩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輕視漢唐古注疏，只爲漢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訓詁的工夫，不談微言大義，所以宋儒嫌他們太淺陋了，笑他們未聞大道。宋儒的理學所以能風行一世，也只爲他們承禪宗的影響，居然也能談玄說妙，一洗「儒門淡薄」之風。現在當理學極絢爛之後，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極困難的事；非經過一番大覺悟或大反動之後，那是不會實現的。明末清初的學者，承王學極盛之後，所以能拋棄那玄妙的理學而回到那淡薄的經學，正是因爲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敗了，閹宦的橫行太可恥了，流寇的禍亂太慘酷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種種的原因構

成了一個有力的反動，方才有那樣的大覺悟，方才有那樣的大決心。況且亂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觀消極的路上去。幸而那時正當古學復興的時期，楊愼、焦竑、胡應麟、陳第等人已把門戶打開，歸有光、錢謙益諸人又極力提倡古注疏。（崇禎十二年吳鳳苞新刻《十三經注疏》，錢謙益為作長序。費氏父子屢引此序。）所以費氏父子從患難裏出來，不致於走入靜坐遯世的墮落路上去，卻在古注疏裏尋出古代儒家所謂「道」，本無談玄說妙的話，乃是治國平天下的實事實功。所以費密說，「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見道之源。」一方面，費氏父子若不經過那種痛苦的經驗，也不容易甘心捨棄那神秘的主靜主敬的理學，誠心地來提倡那「淡薄」的儒學。所以他說，「使觀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費氏父子從痛苦的經驗裏出來，主張實用主義。他們有一個「吾道本旨表」（中，三十九），大略如下：



他們又有一個「先王傳道表」（中，二十八）：

先王傳道

三重：一、議禮，二、制度，三、考文。

九經：一、修身，二、尊賢，三、親親，四、敬大臣，五、體羣臣，
六、子庶民，七、來百工，八、柔遠人，九、懷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四民：士，農，工，商。

他們對於「道」的見解，只是政治的，倫理的，實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裏，成了一部高談性命的根據；而費氏父子在那部書裏只看出那「三重」「九經」幾個政治的觀念。他們認定「儒貴能治天下」；「三重九經」之說雖極淡薄，卻是一種整治社會國家的途徑，比那性命玄談是實用多多的了。

費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談，常說事功爲要，言說爲下。他們常歎息：

>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下，二）

他們也反對宋儒說「下學」爲人事，「上達」爲天理的話。他們說：

> 邵雍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羣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下，三）

這是一種「存疑主義」(Agnosticism)的論調。他們因爲要推開那宋儒的玄學，故輕輕地用「天道遠而難知」一句話，把宋儒的宇宙玄學放在存而不論的地位。放開了那遠而難知的，且來研究那實而易見的：這是實用主義者的存疑主義。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義的態度，要使人離開神學與玄學的圈套，來做科學的工夫。費氏父子的存疑主義也只是要大家離開那太極先天的圈子，來做實學的研究。

他們推開了那無用的道，主張那整治國家，實事實功的道。他們說：

> 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徵，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王之六經四科亂矣。……

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矣，心無不〔在〕腔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禎坐忘，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國民生作有用無用的標準，雖然頗近於狹義的實用主義，然而當時的虛空無稽的玄談實在需要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評判標準。費氏指出宋明的理學只是「深山獨處」的自了漢的哲學，但不適用於「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們的「道」，是要能適用於一切社會階級的：

帝王天命統道，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織紝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下，二十）

這種見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淺近淡薄的，但仔細看來，卻是幾千年無人敢說，無人能說的大見

識。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與人生日用發生交涉；凡與人生日用沒交涉的，凡與社會國家的生活沒關係的，都只是自了漢的玄談，都只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把戲，算不得「道」。他們說：

> 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爲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或可有可無之經。（下，二十）

凡經不起這個實用主義的標準的評判的，都只是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 天下既治，無異于中材；天下已亂，無救于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上，四十五）

這叫做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費氏父子的實用主義，簡單說來，只是

> 教實以致用，學實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個大字。說得更明白點，只是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十五）

說的更明白點，只是

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則有益于國，處則有益于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于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則罷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只是

論政，以身所當者爲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爲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爲定章。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後引的一段話，卽荀卿「法後王」之意，但費氏父子說的更痛快明白。如云，「堯舜三代風氣未開」，此是何等見識！費氏父子又舉封建井田爲例，說明此意。他們說：

欲行郡縣阡陌於先王風尚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於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羣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中，二十三）

這是歷史的眼光。費經虞曾講《中庸》「議禮，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踰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衆論而成一是

也。制者，畫爲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中，二十六）

他們的結論是：

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中，二十四）

應用的標準仍是那實用主義的標準，——「濟時救弊也已」。

四、費氏議論人的態度

費氏父子經過無數痛苦的經驗，深知人情世故，故他們議論人物，往往能持一種忠恕平允的態度。自從宋儒以來，士大夫自居於窮理，其實只是執着一些迂腐的意見；他們拿這些意見來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湊合他們的死板法式。他們自已迷信「無欲」爲理想境界，所以他們上論古人，下論小百姓，也期望他們無私無欲。他們抱着成見，遂不肯細心體諒人們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顥、朱熹以後，學者心眼裏只認得幾個本來沒有的聖人，其餘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們的教主孔丘先生當日本是一個很和平圓通的人，孔丘也肯見見南子，也不拒絕陽貨的豬肉，也和他國裏的一班貴族權臣往來問答；他的弟子也有

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發財的，也有替蒯聵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說過，鄉愿是德之賊，而狂狷卻還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絕四」，而宋儒卻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訓！費氏父子對於宋明理學家的這種態度，最不滿意，常常提出抗論。他們說：

> 夫運代不同，猶四時之遞序；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勳鐘鼎；或其初託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覈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天下稱之；或爲衆所攻而未盡非，或爲衆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譏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爲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爲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爲衡宜百務精當。……此伊尹不求備于一人，孔子論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鍊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爲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罅以爲罪。……固薄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識略高賢遺寃簡册，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

這已是很平允的議論了。他們又說：

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値姦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汚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爲盡失。惟相與煽亂爲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飢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厄，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歟？論事必本于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不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爲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爲不肖。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爲急；或可或否，中正爲宜。倘堅信宋儒刻隘臆說，恐伊、呂、微、箕生于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上，十三）

這種見解，非常平易，卻是宋以後無人敢道的議論。程頤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那種武斷的論調，在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男女。費氏把生命，妻子，產業等等，和義理看作同樣重要的東西；教人要把這各種分子合起來看，不可單拿「義理」一種來評判人。這眞是平允忠厚的態度。

他們又說：

尚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于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媿悔，求以寡過，尚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這一大段中，如「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皆是閱歷有得的名言。宋以來的儒者往往意氣用事，勇於責人，而不自覺其太過。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後人之誣衊王安石，都是道學史上的絕大汚點。費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之」（上，四十四）的不容忍的態度。費氏形容他們：

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一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爲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爲不聞道；自命曰眞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辯論亦從此紛起矣。……於是以儒之說爲昧難測也，儒之意爲執難平也，儒之事爲煩難從也，儒之情爲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爲厲難近也。彼方夷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爲名高，交相惡矣。……立於朝廷，兩相

危陷，……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官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上，四十四——四十五）

宋以來的理學有幾個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費氏父子痛斥這種理學，說他「矜高自大，鄙下實事」。（上，四十七）他們要提倡一種平易近人的「中，實」之道：

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爲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十五）

這眞不愧爲實用主義者的態度。

費氏父子皆有歷史的嗜好，故他們對於古今學派的異同沿革，也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提出一種「心理區別論」來解釋歷史上學派的異同。他們說：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

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乂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敎使柔，沉潛而敎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于用。（上，四十九）

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沉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歟？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沉潛者歟？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于狂；子夏之學多沉潛，門人所傳近于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于道；沉潛而學焉，則以沉潛入于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疑當作因）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們分中行，高明，沉潛三種性質，頗似近世詹姆士（James）說的哲學家有「心硬」「心軟」兩大區別。高明一派，費氏謂近于剛，其實乃是詹姆士所謂「心軟」的一派。沉潛一派，費氏謂近於柔，其實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軟，故富於理想，而易爲想像力所誘惑；自趨於高明，而易陷於空虛。心硬，故重視事實，重視效果；雖不廢想像，而步步腳踏實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墮入拘迂，易陷於支離瑣碎。費氏拿這個區別來說明學術思想史上的派別：

> 後世學者，性本沉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沉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爲沉潛之非高明也。
>
> 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沉潛，學者之高明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爲高明之非沉潛也。
>
> 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羣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敎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于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爲傳也。（上，五十一）

以上說的，皆爲有人問「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而發的。小程子與朱熹屬於沉潛一路，陸王屬於高明一路。費氏此論最爲平允，發前人所未發。費氏父子的家學也屬於沉潛一路，故費密雖受學於孫奇逢，爲王學後人，而他攻擊「良知」之說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復古本《大學》一件事而已。費密作《孫徵君傳》（《耆獻類徵》三百九十七，頁三十六——三十七），只說：

> 其學以澄徹爲宗，和易爲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邃奧，學者安可不造？」徵君則歎以爲果然。

費密所取於孫奇逢，如是而已。費密又自說是子夏七十二傳，是他也自居於沉潛一路。但他屢次自命爲中行，自稱爲「中傳」，自以爲得古經之旨，故對於程朱陸王的玄學方面一律攻擊。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實，都只是他的沉潛的天性的表現。他所攻擊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傳染的方面，並不是他們的沉潛的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他「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沉潛之非高明也。」

但費氏父子的沉潛，雖然是個人天性的表現，卻也是「時代精神」的先驅。八百年前，程頤給他的哥哥程顥作「行狀」，曾述程顥的話道：

>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這是二程當近世哲學開幕時期對於中國當日思想界下的診斷。他們深知當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然而自他們以後，以至明末，五百年

中，程朱之學盛行，結果還只是一種「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兩宋時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這個鬼就是玄學鬼。二程不保邵雍、周敦頤的玄學的宇宙論，卻捨不得那主靜主敬的玄學。朱熹提倡格物窮理，卻又去把二程唾棄的先天太極之學重新掘出來，奉爲玄學的奇寶。陸王唾棄先天太極的玄學，卻又添出了「良知」「心卽理」的玄學。陸王末流的玄學狂熱，更不消說了。高明的病菌彌漫在空氣裏，凡要呼吸的人，多少總得吸一點進去；沉潛的抵抗力强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費密活在程顥之後五百年，他診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風橐霧，可有可無」的診斷。五百年的玄學病，到此已成「强弩之末」；李闖、張獻忠承客氏、魏忠賢之後，屠殺了幾百萬生民，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時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學熱。費氏父子一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他們眞不愧爲時代精神的先驅者！

十三・九・十七　脫稿

1 參見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三十一冊《中國古代哲學史》。

讀《楚辭》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裏，現在整理出來，作爲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它或反證它，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烟瘴氣裏鑽出來，在文學界裏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

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 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傳」敍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旣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旣「疏」了，旣「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眞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

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它們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

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裏，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還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銷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眞有其事，故劉向《說苑》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麽？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1	九歌	9
天問	1	九章	9
遠遊	1	卜居	1
漁父	1	招魂	1
大招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値，我們可斷定此篇爲後人雜湊起來的。「卜居」「漁父」爲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大招」似是模倣「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倣「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倣「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僞作。我們若不顧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爲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一、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二、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三、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四、稍後——楚亡後　「卜居」「漁父」

五、漢人作的　「大招」「遠遊」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烟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注解。朱子的《楚辭集註》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裏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註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値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敎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

> 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說：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說：

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與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　改稿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讀書雜志》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志》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裏最徼幸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眞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

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衞的理由。現在我儘尋它的罅漏，劉先生儘尋它的自衞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着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眞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眞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啓事，劉先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藉着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 因爲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讀書雜志》十三期）

他又說：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讀書雜志》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眞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卽使我們的證據不够完全翻案，只够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本來劉先生並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本來我不能不替他申辯了一句。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眞僞問題；去僞存眞，決不會有害於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裏高興，我們難道因爲他高

與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眞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爲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尙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裏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眞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它，虛心地試驗它，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它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它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曾說：

> 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愼，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十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爲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 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它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顚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可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二、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三、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爲複雜，由陋野變爲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爲全國的，由神變爲人，由神話變爲史事，由寓言變爲事實。

四、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一、《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淸楚，又不完全。

二、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三、漢初寫定的《穀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四、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五、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穀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淸楚分明的井田論。
六、《周禮》更晚出，裏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繁密了。
七、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併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八、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初排本《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〇）[1]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瞭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旣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於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志》十三期）

他又說：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裏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什麼？「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爲原則，而以「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爲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爲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爲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卻是後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於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擧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並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着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爲「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裏，從證據裏，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掃荒叢，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志》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爲「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裏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藉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一、辨認種類的能力，二、預料將來收穫的能力，三、造器械的能力，四、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五、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爲「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他引四條證據：

一、《墨子》「節用」中。

二、《尸子》佚文。

三、《韓非子》「十過」。

四、《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爲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爲「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

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卻眞大膽！他說：

>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眞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爲秦漢時的僞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二、什麼時候尋出的？三、什麼人尋出的？四、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五、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僞（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舉《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敍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爲後人僞

作的。而劉先生卻以爲「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爲僞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對自已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苛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行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十三・二・八

1 參見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四冊《問題與主義》第一八七頁。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序言

這個書目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很想在短時期中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並不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爲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書目，卻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我起初也學着老前輩們的派頭，勸人從「小學」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我近來懺悔了——那種話是爲專家說的，不是爲初學人說的；是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音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經驗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

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老實說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那些國學有成績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幹出來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眞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着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二點。

這個書目不單是爲私人用的，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所以每部書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爲注出。

一、工具之部

書目學要（周貞亮，李之鼎）　南城宜秋館本。這是書目的書目。

書目答問（張之洞）　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記書莊有石印「增輯本」最易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　廣東圖書館刻本，又點石齋石印本最方便。

彙刻書目（顧修）　顧氏原本已不適用，當用朱氏增訂本，或上海北京書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續彙刻書目（羅振玉）　雙魚堂刻本。

史姓韻編（汪輝祖） 刻本稍貴，石印本有兩種。此爲《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 北京晉華書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運森） 商務印書館。

歷代地理韻編，清代輿地韻編（李兆洛） 廣東圖書館本，又坊刻《李氏五種》本。

歷代紀元編（六承如） 《李氏五種》本。

經籍纂詁（阮元等） 點石齋石印本可用。讀古書者，於尋常字典外，應備此書。

經傳釋詞（王引之） 通行本。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等譯編） 上海醫學書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 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子〕：

老子　莊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孫子

孔子集語　**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　**賈誼新書**

春秋繁露　**揚子法言**　**文子纘義**　**黃帝內經**

竹書紀年　**商君書**　**韓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山海經**

浙江公立圖書館（即浙江書局）刻本。上海有鉛印本亦尚可用。彙刻子書，以此部爲最佳。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閒詁（孫詒讓）　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莊子集釋（郭慶藩）　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謙）　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春秋繁露義證（蘇輿）　原刻本。

周禮　通行本。

論衡（王充）　通津草堂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北崇文書局本。

抱朴子（葛洪）　平津館叢書本最佳，亦有單行的；湖北崇文書局本。

四十二章經　金陵刻經處本。以下略舉佛教書。

佛遺教經 同上。

異部宗輪論述記（窺基） 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 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 同上。

般若綱要（葛䵷） 《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够了。揚州藏經院本。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 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 此書譯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即《圓覺經》）（佛陀多羅譯） 金陵刻經處白文本最好。

十二門論（鳩摩羅什譯） 金陵刻經處本。

中論（同上） 揚州藏經院本。

以上兩種，爲三論宗「三論」之二。

三論玄義（隋吉藏撰） 金陵刻經處本。

大乘起信論（僞書） 此雖是僞書，然影響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經處有沙門眞界纂注本

頗便用。

大乘起信論考證（梁啓超）　此書紹介日本學者考訂佛書眞僞的方法，甚有益。商務印書館將出版。

小止觀（一名《童蒙止觀》，智顗撰）　天台宗之書不易讀，此書最便初學。金陵刻經處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　金陵刻經處本。

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疏）　金陵刻經處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立撰）　玄奘爲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偉大人物，此傳爲中國傳記文學之大名著。常州天寧寺本。

華嚴原人論（宗密撰）　有正書局有合解本，價最廉。

壇經（法海錄）　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語錄　此爲禪宗極重要之書，坊間現尚無單行刻本。《大藏經》縮刷本騰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　此書可考見佛教在晉宋齊梁士大夫間的情形。金陵刻經處本。

韓昌黎集（韓愈）　坊間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　《三唐人集》本。

柳河東集（柳宗元）　通行本。

宋元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　馮雲濠刻本，何紹基刻本，光緒五年長沙重刊本。坊間石印本不佳。

明儒學案（黃宗羲）　莫晉刻本最佳。坊間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兩書，保存原料不少，爲宋明哲學最重要又最方便之書。此下所列，乃是補充這兩書之缺陷，或是提出幾部不可不備的專家集子。

直講李先生集（李覯）　商務印書館印本。

王臨川集（王安石）　通行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二程全書（程顥，程頤）　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書（朱熹）　六安涂氏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朱子年譜（王懋竑）　廣東圖書館本，湖北局本。此書爲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書。

陸象山全集（陸九淵）　上海江左書林鉛印本很可用。

陳龍川全集（陳亮）　通行本。

葉水心全集（葉適）　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書（王守仁）　浙江圖書館本。

困知記（羅欽順）　嘉慶四年翻明刻本。正誼堂本。

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艮）　近年東台袁氏編訂排印本最好，上海國學保存會寄售。

羅文恭公全集（羅洪先）　雍正間刻本，《四庫全書》本與此本同。

胡子衡齊（胡直）　此書爲明代哲學中一部最有條理又最有精采之書。《豫章叢書》本。

高子遺書（高攀龍）　無錫刻本。

學蔀通辨（陳建）　正誼堂本。

正誼堂全書（張伯行編）　這部叢書搜集程朱一系的書最多，欲研究「正統派」的哲學的，應備一部。全書六百七十餘卷，價約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現行者爲同治間補刻本。

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　商務印書館。

日知錄（顧炎武）　用黃汝成《集釋》本。通行本。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　單行本。掃葉山房《梨洲遺著彙刊》本。

張子正蒙注（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

思問錄內外篇（王夫之）　同上。

俟解一卷，噩夢一卷（王夫之）　同上。

顏李遺書（顏元，李塨）　《畿輔叢書》本可用。北京四存學會增補全書本。

費氏遺書（費密） 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義疏證（戴震） 《戴氏遺書》本。國學保存會有鉛印本，但已賣缺了。

章氏遺書（章學誠） 浙江圖書館排印本，上海劉翰怡新刻全書本。

章實齋年譜（胡適） 商務印書館出版。

崔東壁遺書（崔述） 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畿輔叢書》本只有《考信錄》，亦可够用了。全書現由亞東圖書館重印，不久可出版。

漢學商兌（方東樹） 此書無甚價值，但可考見當日漢宋學之爭。單行本，朱氏《槐廬叢書》本。

漢學師承記（江藩） 通行本，附《宋學師承記》。

新學僞經考（康有為） 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記探源（崔適） 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叢書（章炳麟） 康寶忠等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刻本。

三、文學史之部

詩經集傳（朱熹） 通行本。

詩經通論（姚際恆）　聞商務印書館將重印。

詩本誼（龔橙）　浙江圖書館《半广叢書》本。

詩經原始（方玉潤）　聞商務印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

詩毛氏傳疏（陳奐）　《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　《禮記》第二篇。

春秋左氏傳　通行本。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有鉛印補注本。

楚辭集注，附辨證後語（朱熹）　通行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編）　廣雅局本。此書搜集最富，遠勝於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　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　江蘇書局本。

續古文苑（孫星衍編）　江蘇書局本。

文選（蕭統編）　上海會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龍（劉勰）　原刻本；通行本。

樂府詩集（郭茂倩編）湖北書局刻本。

唐文粹（姚鉉編）江蘇書局本。

唐文粹補遺（郭麐編）同上。

全唐詩（康熙朝編）揚州原刻本，廣州本，石印本，五代詞亦在此中。

宋文鑑（呂祖謙編）江蘇書局本。

南宋文範（莊仲方編）同上。

南宋文錄（董兆熊編）同上。

宋詩鈔（呂留良、吳之振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管庭芬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六十家詞（毛晉編）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

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陽山房。

彊邨所刻詞（朱祖謀編刻）原刻本。

王朱兩位刻的詞集都很精，這是近人對於文學史料上的大貢獻。

太平樂府（楊朝英編）《四部叢刊》本。

陽春白雪（楊朝英編）南陵徐氏《隨菴叢書》本。

以上兩種爲金元人曲子的選本。

董解元絃索西廂（董解元）　劉世珩暖紅室彙刻傳奇本。

元曲選一百種（臧晉叔編）　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

金文最（張金吾編）　江蘇書局本。

元文類（蘇天爵編）　同上。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　商務印書館本。

京本通俗小說　這是七種南宋的話本小說，上海蟫隱廬《煙畫東堂小品》本。

宣和遺事　《士禮居叢書》本；商務印書館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話殘本　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編）　江蘇書局本。

列朝詩集（錢謙益編）　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明詩綜（朱彝尊編）　原刻本。

六十種曲（毛晉編刻）　汲古閣本。此書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雜劇（沈泰編）　董康刻本。

暖紅室彙刻傳奇（劉世珩編刻）　原刻本。

笠翁十二種曲（李漁） 原刻巾箱本。

九種曲（蔣士銓） 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 通行本。

長生殿（洪昇） 通行本。

清代戲曲多不勝舉；故舉李蔣兩集，孔洪兩種歷史戲，作幾個例而已。

曲苑 上海古書流通處（?）編印本。此書彙集關於戲曲的書十四種，中如焦循「劇說」，如梁辰魚「江東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價亦廉，故存之。

綴白裘 這是一部傳奇選本，雖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戲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戲曲總集中，這也是一部重要書了。通行本。

曲錄（王國維） 《晨風閣叢書》本。

湖海文傳（王昶編） 所選都清朝極盛時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學者的文人」的文學。原刻本。

湖海詩傳（王昶編） 原刻本。

結埼亭集（全祖望） 借樹山房本。

惜抱軒文集（姚鼐） 通行本。

大雲山房文稿（惲敬）　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義（章學誠）　貴陽刻本，浙江局本，鉛印本。

龔定盦全集（龔自珍）　萬本書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國藩）　《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專集，不易選擇；我經過很久的考慮，選出全，姚，惲，章，龔，曾六家來作例。

吳梅村詩（吳偉業）　《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本，無注；此外有靳榮藩《吳詩集覽》本，有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本。

甌北詩鈔（趙翼）　《甌北全集》本，單行本。

兩當軒詩鈔（黃景仁）　光緒二年重刻本。

巢經巢詩鈔（鄭珍）　貴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頗有誤字。

秋蟪吟館詩鈔（金和）　鉛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刪減。

人境廬詩鈔（黃遵憲）　日本鉛印本。

清代詩也很難選擇。我選梅村代表初期，甌北與仲則代表乾隆一朝；鄭子尹與金亞匏代表道咸同三朝；黃公度代表末年的過渡時期。

明清兩朝小說：

水滸傳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西遊記（吳承恩）　亞東圖書館再版本。

三國志　亞東圖書館本。

儒林外史（吳敬梓）　亞東圖書館四版本。

紅樓夢（曹霑）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水滸後傳（陳忱，自署古宋遺民。）　此書借宋徽欽二帝事來寫明末遺民的感慨，是一部極有意義的小說。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

鏡花緣（李汝珍）　此書雖有「掉書袋」的毛病，但全篇爲女子爭平等的待遇，確是一部很難得的書。亞東圖書館本。

以上各種，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搜集了文學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觀　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俠五義　此書後經俞樾修改，改名《七俠五義》。此書可代表北方的義俠小說。舊刻本；《七俠五義》流通本較多。亞東圖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

兒女英雄傳（文康）　蜚英館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寃（吳沃堯）　廣智書局鉛印本。

恨海（吳沃堯）　通行本甚多。

老殘遊記（劉鶚）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以上略舉十三種，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說。

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胡適）　本書卷二。[1]

〔跋〕

文學史一部，注重總集：無總集的時代，或總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擧別集。因爲文集太多，不易收買，尤不易遍覽，故爲初學人及小圖書館計，皆宜先從總集下手。

〔附錄一〕《清華週刊》記者來書

適之先生：

在《努力週報》的增刊，《讀書雜志》第七期上，我們看見先生爲清華同學們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我們看完以後，心中便起了若干問題，現在願說給先生聽聽，請先生賜敎。

第一，我們以爲先生這次所說的國學範圍太窄了。先生在文中並未下國學的定義，但由先生所擬的書目推測起來，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而言。思想史與文學史便是代表國學麽？先生在《國學季刊》的發

列宣言裏，擬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國學研究，這是先生在該宣言裏指示我們的。旣然如此，爲什麼先生不在國學書目文學史之部以後，加民族史之部，語言文學史之部，經濟史之部……呢？

第二，我們一方面嫌先生所擬的書目範圍不廣；一方面又以爲先生所談的方面——思想史與文學史——談得太深了，不合於「最低限度」四字。我們以爲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應該顧到兩種事實：第一是我們的時間，第二是我們的地位。我們清華學生，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八年之內一個普通學生，於他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外，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程度，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第二，清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敎育家對於一般留學生，要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學程度，這是第二件事應該考慮的。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是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敎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爲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那個書目中的書，無論學機械工程的，學應用化學的，學哲學文學，學政治經濟的，都應該念，都應該知道。我們希望讀過那書目中所列的書籍以後，對於中國文化，能粗知大略。至於先生在《讀書雜志》第七期所列的書目，似乎是爲有志專攻哲學或文學的人作參考之用的，我們希望先生將來能繼續發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書目，讓有志於

該種學科的青年，有一個深造的途徑。

敬祝先生康健

清華週刊記者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錄二〕答書

記者先生：

關於第一點，我要說，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爲國學最低限度；其餘民族史、經濟史等等，此時更無從下手，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都無法可擬。

第二，關於程度方面和時間方面，我也曾想過，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爲清華的同學，但我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放寬了。我的意思是要用這書目的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有力的，多買些；有時間的，多讀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沒有伸縮的餘地了。先生以爲是嗎？

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倒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爲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

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只好在原書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眞是不可少的了。此外還應加上一部《九種紀事本末》（鉛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書：

書目答問　法華經　左傳

中國人名大辭典　阿彌陀經　文選

九種紀事本末　壇經　樂府詩集

中國哲學史大綱　宋元學案　全唐詩

老子　明儒學案　宋詩鈔

四書　王臨川集　宋六十家詞

墨子閒詁　朱子年譜　元曲選一百種

荀子集注　王文成公全書　宋元戲曲史

韓非子　清代學術概論　綴白裘

淮南鴻烈集解　章實齋年譜　水滸傳

周禮　崔東壁遺書　西遊記

論衡　新學僞經考　儒林外史

佛遺教經　詩集傳　紅樓夢

〔附錄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梁啓超）

兩月前《清華週刊》記者以此題相屬，蹉跎久未報命。頃獨居翠微山中，行篋無一書，而記者督責甚急，乃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並書名篇名亦憶錯誤者，他日當更補正也。

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啓超**　碧摩巖攬翠山房

目次：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論語　孟子

《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註》爲其生平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清儒注本：《論語》則有戴望《論語注》，《孟子》則有焦循《孟子正義》最善。戴氏服膺顏習齋之學，最重實踐，所注似近孔門眞際；其訓詁亦多較朱注爲優。其書簡潔易讀。焦氏服膺戴東原之學，其《孟子正義》在清儒諸經新疏中爲最佳本。但文頗繁，宜備置案頭，遇不解時或有所感時則取供參考。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乃戴氏一家哲學，並非專爲注釋《孟子》而作。但其書極精闢，學者終須一讀。最好是於讀《孟子》時並讀之，既知戴學綱領，亦可以助讀《孟子》之興味。

焦循《論語通釋》，乃摹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將全部《論語》拆散，標舉重要諸義如言仁言忠恕……等列爲若干目通觀而總詮之，可稱治《論語》之一良法，且可應用其法以治他書。

右兩書篇頁皆甚少，易讀。

陳澧《東塾讀書記》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最爲精切。其書不過二三十頁（？），宜一讀以觀前輩治學方法，且於修養亦有益。

易經

此書爲孔子以前之哲學書。孔子爲之注解，雖奧衍難究，然總須一讀。吾希望學者將《繫辭傳》《文言傳》熟讀成誦；其《卦象傳》六十四條，則用別紙鈔出，隨時省覽。

後世說《易》者言人人殊。爲修養有益起見，則程頤之《程氏易傳》差可讀。說《易》最近眞者，吾獨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樓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稱精詣。學者如欲深通此經，可取讀之。否則可以不必。

禮記

此書爲戰國及西漢之「儒家言」叢編，內中有極精純者，亦有極破碎者。吾希望學者將「中庸」「大學」「禮運」「樂記」四篇熟讀成誦。「曲禮」「王制」「檀弓」「禮器」「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儒衣」「大傳」「祭義」「祭法」「鄉飲酒義」諸篇多瀏覽數次，且摘錄其精要語。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經注疏》內鄭注孔疏。《孝經》之性質與《禮記》同，可當《禮記》之一篇讀。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爲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除「備城門」以下各篇外，餘篇皆宜精讀。注釋書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最善，讀《墨子》宜即讀此本。「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張惠言《墨子經說

解》及梁啓超《墨經》兩書可參觀，但皆有未精愜處。「小取篇」有胡適新詁可參觀。梁啓超《墨子學案》，屬通釋體裁，可參觀助興味；但其書爲臨時講義，殊未精審。

莊子

「內篇」七篇及「雜篇」中之「天下篇」最當精讀。注釋有郭慶藩之《莊子集釋》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最當精讀。餘亦須全部瀏覽。注釋書王先謙《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愼子　公孫龍子

今存者皆非完書。但三子皆爲先秦大哲，雖斷簡亦宜一讀；篇帙甚少，不費力也。《公孫龍子》之眞僞，尚有問題。三書皆無善注。《尹文子》《愼子》易解。

韓非子

法家言之精華。須全部瀏覽。（其特別應精讀之諸篇，因手邊無原書，臚舉恐遺漏，他日補列。）注釋書王先愼《韓非子集釋》差可。

管子

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呂氏春秋

此爲中國最古之類書。先秦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瀏覽。

淮南子

此爲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稍精讀。注釋書聞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頗好。

春秋繁露

此爲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讀。注釋書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頗好。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爲通釋體裁，宜參看。

鹽鐵論

此書爲漢代儒家法家對於政治問題對壘抗辯之書，宜瀏覽。

論衡

此書爲漢代懷疑派哲學，宜瀏覽。

抱朴子

此書爲晉以後道家言代表作品，宜瀏覽。

列子

晉人僞書，可作魏晉間玄學書讀。

右所列爲漢晉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間思想界著光采者爲佛學，其書目當別述。以下舉宋以

後學術之代表書。但爲一般學者節嗇精力計，不願多舉也。

近思錄　朱熹著，江永注。

讀此書可見程朱一派之理學其內容何如。

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　王懋竑著

此書敘述朱學全面目，最精要有條理。

若欲研究程朱學派，宜讀《二程遺書》及《朱子語類》。非專門斯業者可置之。

南宋時與朱學對峙者尚有呂東萊之文獻學一派，陳龍川、葉水心之功利主義一派，及陸象山之心學一派。欲知其詳，宜讀各人專集。若觀大略，可求諸宋元學案中。

傳習錄　王守仁語，徐愛、錢德洪等記。

讀此可知王學梗概。欲知其詳，宜讀《王文成公全書》。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宋元學案　黃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

此二書爲宋元明三朝理學之總紀錄，實創作的學術史。《明儒學案》中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蕺山諸案最精善。《宋元學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馬光）諸案失之太繁，反不見其眞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因

有門戶之見，故爲排斥。欲知荊公學術，宜看《王臨川集》。

此二書卷帙雖繁，吾總望學者擇要瀏覽，因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滙，影響於近代甚深。且彙諸家爲一編，讀之不甚費力也。

清代學術史可惜尚無此等佳著。唐鑑之《國朝案小識》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學派爲立腳點，褊狹固陋，萬不可讀。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亦學案體裁，較好。但江氏學識亦凡庸，殊不能敍出各家獨到之處。萬不得已，姑以備參考而已。啓超方有事於清儒學案，汗青尚無期也。

日知錄　亭林文集　顧炎武著

顧亭林爲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著

黃梨洲爲清初大師之一。其最大貢獻在兩學案。此小册可見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問錄　王夫之著

王船山爲清初大師之一。非通觀全書，不能見其神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別爲系統的整理，則學者不能讀。聊擧此書發凡，實不足以代表其學問之全部也。

顏氏學記　戴望編

顏習齋爲清初大師之一。戴氏所編學記，頗能傳其眞。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但其所集習

齋語要，恕谷（李塨）語要，將攻擊宋儒語多不錄，稍失其眞。

顧黃王顏四先生之學術，爲學者所必須知，然其著述皆浩瀚或散殊，不易尋繹。啓超行將爲系統的整理記述以餉學者。

東原集　戴震著

雕菰樓集　焦循著

戴東原、焦理堂爲清代經師中有精深之哲學思想者。讀其集可知其學並知其治學方法。啓超所擬著之「清儒學案」「東原理學」兩案正在屬稿中。

文史通義　章學誠著

此書雖以文史標題，實多論學術流別，宜一讀。胡適著《章實齋年譜》，可供參考。

大同書　康有爲著

南海先生獨創之思想在此書。曾刊於《不忍雜誌》中。

國故論衡　章炳麟著

可見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詳當讀《章氏遺書》。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著

有偏宕處，亦有獨到處。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胡適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著

將讀先秦經部子部書，宜先讀此兩書。可引起興味，並啓發自己之判斷力。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欲略知清代學風，宜讀此書。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尚書

內中惟二十八篇是眞書，宜精讀。但其文佶屈聱牙，不能成誦亦無妨。餘篇屬晉人僞撰，一瀏覽便足（眞僞篇目，看啓超所著《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日內當出版）。此書非看注釋不能解，注釋書以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好。

逸周書

此書眞僞參半。宜一瀏覽。注釋書有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頗好。

竹書紀年

此書現通行者爲元明人僞撰。其古本，清儒輯出者數家。王國維所輯最善。

國語　**春秋左氏傳**

此兩書或本爲一書，由西漢人析出（？），宜合讀之。《左傳》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成誦，於學文甚有益。讀《左傳》宜參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學方法。

戰國策

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於學文有益。

周禮

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爲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

考信錄 崔述著

此書考證三代史事實最謹嚴，宜一瀏覽，以爲治古史之標準。

資治通鑑

此爲編年政治史最有價值之作品。雖卷帙稍繁，總希望學者能全部精讀一過。若苦乾燥無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門類。標治摘記，作將來著述資料（吾少時曾用此法，雖無成書，然增長興味不少）。王船山《讀通鑑論》，批評眼光，頗異俗流，讀《通鑑》時取以並讀，亦助興之一法。

續資治通鑑 畢沅著

此書價值遠在司馬光原著之下，自無待言；無視彼更優者，姑以備數耳。或不讀《正續資治通鑑》，而讀「九種紀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則彼；必須有一書經目者。

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

三書卷帙浩繁。今爲學者摘其要目：「田賦考」「戶口考」「職役考」「市糴考」「徵榷考」「國用

考」「錢幣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四裔考」必須讀。「王禮考」「封建考」「象緯考」……絕對不必讀。其餘或讀或不讀隨人（手邊無原書，不能具記其目，有漏略當校補）。各人宜因其所嗜，擇類讀之。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者，則讀前七考。餘仿此。馬氏《文獻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創作，應學《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資料較豐富耳。吾輩讀舊史，所貴者惟在原料，鑪錘組織，當求之在我也。《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可與《通考》合讀。

通志二十略

鄭漁仲學識史才，皆邁尋常。《通志》全書卷帙繁，不必讀。《二十略》則其精神所聚，必須瀏覽。其中與通考門類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校讎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鑑通考，已浩無涯涘，更語及龐大之《二十四史》，學者幾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終不可不讀。其故有二：一、現在既無滿意之通史，不讀《二十四史》，無以知先民活動之遺跡。二、假令雖有佳的通史出現，然其書自有別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終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終久仍爲國民應讀之書。

書既應讀，而又浩繁難讀，則如之何？吾今試爲學者擬摘讀之法數條。

一曰就書而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俗稱《四史》。其書皆大史家一手著述，體例精嚴；且時代近古，向來學人誦習者衆，在學界之勢力與六經諸子埒。吾輩爲常識計，非一讀不可。吾希

望學者將此《四史》之列傳，全體瀏覽一過，仍摘出若干篇稍微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舉其目亦可，但手邊無原書，當以異日）。《四史》之外，則《明史》共認爲官修書中之最佳者，且時代最近，亦宜稍微詳讀。

二曰就事分類而摘讀志。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則讀「平準書」「食貨志」；欲研究音樂，則讀「樂書」「樂志」；欲研究兵制，則讀「兵志」；欲研究學術史，則讀「藝文志」「經籍志」，附以「儒林傳」；欲研究宗教史，則讀《魏書》「釋老志」（可惜他史無之）。……每研究一門，則通各史此門之志而讀之，且與《文獻通考》之此門合讀。當其讀時，必往往發現許多資料散見於各傳者，隨即跟蹤調查其傳以讀之。如此引申觸類，漸漸便能成爲經濟史、宗教史……等等之長編，將來薈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類而摘讀傳。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古人所以貴讀史者以此。全史名傳既不能徧讀（且亦不必），則宜擇偉大人物之傳讀之，每史亦不過一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擇讀：如欲研究學術史，則讀「儒林傳」及其他學者之專傳；欲研究文學史，則讀「文苑傳」及其他文學家之專傳。……用此法讀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國傳」「蠻夷傳」「土司傳」等，包含種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最多，極有趣，吾深望學者一讀之。

廿二史劄記　趙翼著

學者讀正史之前，吾勸其一瀏覽此書。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

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內中校勘文字異同之部約占三分一，不讀亦可。）

聖武記　魏源著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蹟，至今尚無一完書可讀，最爲遺憾。姑舉此二書充數。魏默深有良史之才，《聖武記》爲《紀事本末》體裁，敍述綏服蒙古，戡定金川，撫循西藏……諸役，於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中間進行之次序，若指諸掌，實罕見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瀏覽，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蹟大概。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讀（有譯本）。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著

此爲最有組織的地理書。其特長在專論形勢，以地域爲經，以史蹟爲緯，讀之不感乾燥。此書卷帙雖多，專讀其敍論（至各府止），亦不甚費力，且可引起地理學興味。

史通　劉知幾著

此書論作史方法，頗多特識，宜瀏覽。章氏《文史通義》，性質略同，範圍較廣，已見前。

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著

讀之可增史學興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韻文書類

詩經

希望學者能全部熟讀成誦；即不爾，亦須一大部分能舉其詞。注釋書，陳奐《詩毛氏傳疏》最善。

楚辭

屈宋作，宜熟讀，能成誦最佳。其餘可不讀。注釋書，朱熹《楚辭集註》較可。

文選

擇讀。

樂府詩集　郭茂倩編

專讀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漢古辭，以見魏六朝樂府風格。其他不必讀。

魏晉六朝人詩宜讀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謝玄暉。無單行集者，可用張溥《漢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闓運《八代詩選》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王右丞集

孟襄陽集

韋蘇州集

高常侍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李義山集
王臨川集（詩宜用李壁注本）
蘇東坡集
元遺山集
陸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詩文集。
唐百家詩選　王安石選
宋詩鈔　呂留良鈔
以上唐宋詩選本。
淸眞詞　周美成
醉翁琴趣　歐陽修
東坡樂府　蘇軾
屯田集　柳永

淮海詞 秦觀

樵歌 朱敦儒

稼軒詞 辛棄疾

後村詞 劉克莊

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

碧山詞 王沂孫

夢窗詞 吳文英

以上宋人詞集。

西廂記

琵琶記

牡丹亭

桃花扇

長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門所列書，專資學者課餘諷誦陶寫情趣之用，既非爲文學專家說法，尤非爲治文學史者說法，故不曰文學類，而曰韻文類。文學範圍，最少應包含古文（駢散文）及小說。吾以爲苟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

說之必要。至於古文，本不必別學。吾輩總須讀周秦諸子《左傳》《國策》《四史》《通鑑》及其關於思想關於記載之著作，苟能多讀，自能屬文。何必格外標舉一種名曰古文耶？故專以文鳴之文集不復錄（其與學問有關係之文集散見各門）。《文選》及韓柳王集聊附見耳。學者如必欲就文求文，無已，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可用也。

清人不以韻文見長，故除曲本數部外，其餘詩詞皆不復列舉。無已，則於最初期與最末期各舉詩詞家一人，吳偉業之《梅村詩集》與黃遵憲之《人境廬詩集》，成德之《飲水詞》與文焯之《樵風樂府》也。

（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著

說文釋例　王筠著

段著爲《說文》正注。朱注明音與義之關係。王著爲《說文》通釋。讀此三書，略可通《說文》矣。

經傳釋詞　王引之著

古書疑義舉例　俞樾著

文通　馬建忠著

讀此三書，可知古人語法文法。

經籍纂詁　阮元編

此書彙集各字之義訓，宜置備檢查。

文字音韻，爲清儒最擅之學，佳書林立。此僅舉入門最要之數種。若非有志研究斯學者，並此諸書不讀亦無妨耳。

（戊）隨意涉覽書類

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尚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爲何。隨意涉獵，初時並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吾故雜舉有用或有趣之各書，供學者自由翻閱之娛樂。讀此者不必順頁次，亦不必求終卷也。（各書亦隨憶想所及雜舉，無復詮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乾隆間四庫館，董其事者皆一時大學者，故所作提要，最稱精審，讀之可略見各書內容（中多偏至語，自亦不能免）。宜先讀各部類之敍錄，其各書條下則隨意抽閱。有所謂存目者，其書被屏，不收入四庫者也。內中頗有怪書，宜稍注意讀之。

世說新語

將晉人談玄語分類纂錄，語多雋妙，課餘暑暇之良伴侶。

水經注　酈道元撰，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蹟，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

文心雕龍　劉勰撰

六朝人論文書。論多精到，文亦雅麗。

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　慧立撰

此爲玄奘法師詳傳。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爲大思想家，讀之可以增長志氣。

徐霞客遊記

霞客晚明人，實一大探險家。其書極有趣。

夢溪筆談　沈括

宋人筆記中含有科學思想者。

困學紀聞　王應麟撰，閻若璩註。

宋人始爲考證學者。顧亭林《日知錄》頗仿其體。

通藝錄　程瑤田撰

清代考證家之博物書。

癸巳類稿　兪正燮撰

多爲經學以外之考證，如考棉花來歷，考婦人纏足歷史，輯李易安事蹟等，又多新穎之論，如論妒非婦人惡德等。

東塾讀書記　陳澧撰

此書僅五册，十餘年乃成。蓋合數十條筆記之長編乃成一條筆記之定稿，用力最爲精苦，讀之可識搜集資料及駕馭資料之方法。書中論鄭學，論朱學，論諸子，論三國諸卷最善。

庸盦筆記　薛福成

多記清咸豐同治間掌故。

張太岳集　張居正

江陵爲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齋先生全書　王艮

吾常名心齋爲平民的理學家。其人有生氣。

朱舜水遺集　朱之瑜

舜水爲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　李塨

恕谷爲習齋門下健將，其文勁達。

鮚琦亭集　全祖望

集中記晚明掌故甚多。

潛研堂集　錢大昕

竹汀爲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對倫理問題，亦頗有新論。

述學　汪中

容甫爲治諸子學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漢晉間，極遒美。

洪北江集　洪亮吉

北江之學長於地理，其小品駢體文描寫景物，美不可言。

定盦文集　龔自珍

吾少時心醉此集，今頗厭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

右二集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曾滌生文章尤美，集桐城派之大成。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詩話中資料頗豐富者。

詞苑叢談　徐釚

唯一之詞話，頗有趣。

語石　葉昌熾

以科學方法治金石學，極有價值。

書林清話　葉德輝

論刻書源流及藏書掌故，甚好。

廣藝舟雙楫　康有爲

論寫字，極精博，文章極美。

劇說　焦循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二書論戲劇，極好。

既謂之涉覽，自然無書不可涉，無書不可覽，本不能臚舉書目。若擧之非累數十紙不可。右所列不倫不類之寥寥十餘種，隨雜憶所及當坐譚耳。若繩以義例，則笑絕冠纓矣。

〔附錄一〕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右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爲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今再爲擬一眞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書　易經　書經　詩經　禮記　左傳　老子　墨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　楚辭　文選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以上各書，無論學鑛、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眞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附錄二〕治國學雜話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爲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爲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最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

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爲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在……裏，做完一天的工作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

但是將來這種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學校時代已經決定。因爲必須養成讀書習慣纔能嘗着讀書趣味。人生一世的習慣，出了學校門限，已經鐵鑄成了。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

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最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你這樣待遇它，它給回你的愉快報酬，最少也和讀外國書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就在這一點。吃現成飯，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是最沒有出息的人纔喜歡的。一種問題，被別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教科書樣子給

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緻不刻入。專門喜歡讀這類書的人，久而久之，會把自己創作的才能汩沒哩。在紐約、芝加哥筆直的馬路嶄新的洋房裏舒舒服服混一世，這個人一定是過的毫無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過有意味的生活，須是哥侖布初到美洲時。

中國學問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礦苗異常豐富。但非我們親自絞腦筋絞汗水，卻開不出來。翻過來看，只要你絞一分腦筋一分汗水，當然還你一分成績，所以有趣。

所謂中國學問界的礦苗，當然不專指書籍，自然界和社會實況，都是極重要的。但書籍爲保存過去原料之一種寶庫，且可以爲現在實測各方面之引綫。就這點看來，我們對於書籍之浩瀚，應該歡喜感謝它，不應該厭惡它。因爲我們的事業比方要開工廠，原料的供給，自然是越豐富越好。

讀中國書，自然像披沙揀金，沙多金少。但我們若把它作原料看待，有時尋常人認爲極無用的書籍和語句，也許有大功用。須知工廠種類多着呢。一個廠裏頭還有許多副產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鈔錄或筆記。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它徵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細密，動輒伸着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即刻鈔下（短的鈔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頁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它，

便成一篇名著。想看這種痕跡，讀趙甌北的《廿二史劄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最容易看出來。

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眞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了這條路。做動植物的人，懶得採集標本，說他會有新發明，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

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鈔書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它鈔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着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它鈔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經驗得來的實況。諸君試拿一年工夫去試試，當知我不說謊。

先輩每教人不可輕言著述。因爲未成熟的見解公布出來，會自誤誤人，這原是不錯的，但青年學生「斐然有述作之譽」，也是實際上鞭策學問的一種妙用。譬如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下各文，汎汎讀去，沒有什麼所得。倘若你一面讀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這篇考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你所讀的自然加幾倍受用。譬如同讀一部《荀子》，某甲汎汎讀去，某乙一面讀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學案，讀過之後，兩個人的印象深淺，自然不同。所以我很獎勵青年好著書的習慣。至於所著的書，拿不拿給人看，什麼時候纔認成功，這還不是你的自由嗎？

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涉覽的。因爲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諸經諸

子《四史》《通鑑》等書，宜入精讀之部，每日指定某時刻讀它，讀時一字不放過，讀完一部纔讀別部。想鈔錄的隨讀隨鈔。另外指出一時刻，隨意涉覽。覺得有趣，注意細看；覺得無趣，便翻次頁。遇有想鈔錄的，也俟讀完再鈔，當時勿窒其機。

諸君勿因初讀中國書勤勞大而結果少，便生退悔。因爲我們讀書，並不是想專向現時所讀這一本書裏頭現錢現貨的得多少報酬，最要緊的是涵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和磨鍊出善讀書的腦力。青年期所讀各書，不外借來做達這兩個目的的梯子。我所說的前提倘若不錯，則讀外國書和讀中國書當然都各有益處。外國名著，組織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齊齊擺出來，可以做我們的模範；這是好處。我們滑眼讀去，容易變成享現成福的少爺們，不知甘苦來歷，這是壞處。中國書未經整理，一讀便是一個悶頭棍，每每打斷趣味，這是壞處。逼着你披荆斬棘，尋路來走，或者走許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斷無冤枉，走錯了回頭，便是絕好教訓）。從甘苦閱歷中磨鍊出智慧，得苦盡甘來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卻最眞切，這是好處。

還有一件：我在前項書目表中，有好幾處寫「希望熟讀成誦」字樣。我想諸君或者以爲甚難，也許反對說我頑舊。但我有我的意思，我並不是獎勵人勉強記憶。我所希望熟讀成誦的有兩種類。一種類是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一種類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須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纔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着根柢，不知不覺會「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纔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它給我們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臨時纔用得着。我所以

有些書希望熟讀成誦者在此。但亦不過一種格外希望而已，並不謂非如此不可。

最後我還專向清華同學諸君說幾句話：我希望諸君對於國學的修養比旁的學校學生格外加功。諸君受社會恩惠，是比別人獨優的。諸君將來在全社會上一定占勢力，是眼看得見的。諸君回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饒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若這樣便有影響，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諸君須要牢牢記着：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纔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

〔附錄三〕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爲他文不對題。胡君說：「並不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爲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依我看，這個書目，爲「國學已略有根柢而知識絕無系統」的人說法，或者還有一部分適用。我想：《清華週刊》諸君所想請敎胡君的並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卻讀商務印書館敎科書之外沒有讀過一部中國書」的青年們打算。若我所猜不錯，那麼，胡君答案，相隔太遠了。

胡君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爲立腳點。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藉的資料（對不對又另是一問題，現在且不討論）。殊不知一般青年，並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裏頭的書什有七八可以不讀。眞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卻又不夠了。

胡君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爲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卻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對，只好說是哲學史、文學史家私人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學生（尤其清華）正苦於跑進圖書館裏頭不知讀什麼書纔好，不知如何讀法，你給他一張圖書館書目，有何用處。何況私人購書，談何容易。這張書目，如何能人人購置。結果還不是一句話嗎？

我最詫異的：胡君爲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鑑》是要「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纔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平心而論，做文學史（尤其做白話文學史）的人，這些書自然該讀。但胡君如何能因爲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強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歡金石學，儘可將金石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某人喜歡地理學，儘可以將地理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雖然，只是爲本行人說法，不能應用於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書，大半和《金石萃編》《愙齋集古錄》《殷墟書契考釋》（金石類書）《水道提綱》《朔方備乘》《元史譯文證補》（地理類書）等等同一性質。雖不是不應讀之書，卻斷不是人人必應讀之書。（胡君覆《清華週刊》信說：「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依着這句話，留學生最少也該知道《殷墟書契考釋》《朔方備乘》……是應該知道的書。那麼，將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搬字過紙更列舉後出書千數百種便了，

何必更開最低限度書目？須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讀」又別是一件事。）

我的主張，很是平淡無奇。我認定史部書爲國學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鑑》《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關係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有了這種常識之人不自滿足，想進一步做專門學者時，你若想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你就請敎胡君這張書目。你若想做別一項專門家，還有許多門我也可以勉強照胡君樣子替你另開一張書目哩。

胡君對於自己所好的兩門學問研究甚深，別擇力甚銳，以爲一般青年也該如此，不必再爲別擇，所以把許多書目臚列出來便了。試思一百多册的《正誼堂全書》千篇一律的「理氣性命」，叫青年何從讀起？何止正誼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論》，告訴青年說這書該讀，他又何從讀起？至於其文學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古文苑》《續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詩》《宋文鑑》《南宋文範》《南宋文錄》《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四印齋宋元詞》《彊邨所刻詞》《元曲選百種》《金文最》《元文類》《明文在》《列朝詩集》《明詩綜》《六十種曲》等書，我大略估計，恐怕總數在一千册以上，叫人從何讀起？青年學生，因爲我們是「老馬識途」，虛心請敎，最少也應告訴他一個先後次序。例如唐詩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你去讀《全唐詩》便了。《宋詞》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請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讀。若說你全部讀過後自會別擇，誠然不錯。只怕他索性不讀便了。何況青年若有這許多精力日力來讀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學書，何如用來讀《二十四史》《九通》呢？

還有一層：胡君忘却學生沒有最普通的國學常識時，有許多書是不能讀的。試問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源》懂他說的什麼？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是什麼？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懂他說的什麼？這不過隨手擧幾個例，其他可以類推。假如有一位學生（假定還是專門研究思想史的學生），敬謹遵依胡君之教，順着他所開書目讀去，他的書明明沒有《尚書》《史記》《漢書》這幾部書，你想這位學生，讀到崔述、康有爲、崔適的著述時，該怎麼樣狼狽呢？胡君之意，或者以這位學生早已讀過《尚書》《史記》《漢書》爲前提，以爲這樣普通書，你當然讀過，何必我說。那麼，《四書》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總而言之，《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爲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眞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思想史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緣故，我也要求胡君答覆。）

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爲是不合用的。

1 參見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八册《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

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梁任公先生近來把他十餘年來讀《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隨時做的簽注，輯爲一書，寫成《墨經校釋》四卷。他因爲我也愛讀這幾篇書，故寫信來，要我做一篇序。我曾發願，要做一部《墨辯新詁》，不料六七年來，這書還沒有寫定。現在我見了梁先生這部《校釋》，心裏又慚愧，又歡喜。這篇序，我如何敢辭呢？

梁先生的校釋，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的校釋大不相同。我們看這部書，便知道梁先生在這四篇書上着實用過許多工夫。我們雖未必都能贊同他的見解，但這裏面很有許多新穎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學的人的參考。例如「經說下」第六十七條：「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梁先生據明嘉靖癸丑本，於「則」字上校增「可」字。嘉靖本近始由上海涵芬樓列入《四部叢刊》印行，但從前校《墨子》的人都不曾見此本，故梁先生這一條乃是用嘉靖本校《墨子》的第一次。將來一定有人繼起，把嘉靖本與他本的異同得失，一一校勘出來。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現在梁先生這部新書，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廣的新興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讀《墨子》的人的歡迎，是無可疑的。但梁先生還要我在這篇序裏「是正其譌謬」。他這樣的虛心與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僅僅應酬的序。我讀了這部書，略有一點意見，貢獻出來，請梁先生切實指教。

梁先生自己說他治這部書的方法中有一條重要的公例：「凡『經說』每條之首一字，必牒學所說『經』文此條之首一字以爲標題。此字在『經』文中可以與下文連讀成句；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用了這條公例，校改了許多舊注。他自己說：「竊謂循此以讀，可以無大過。」他所改的地方，如「經說下」第八條牒出「異」字，如「經說下」第四十九條牒出「知」字，確然都可自立一說，可供治墨學的參考。但我覺得他把這條公例定的太狹窄了，應用時確有許多困難；若太拘泥了，一定要發生很可指摘的穿鑿傅會。例如「經說下」第六條牒出「不」字，第七條又牒出「不」字，似乎太牽强了。牒出標題的辦法，——假令眞有此辦法，——不過是要求標題的分清醒目，似乎不致牒出像「不」字那樣最常用的字罷？依我個人的愚見，我們至多只可說，「『經說』每條的起首，往往標出『經』文本條中的一字或一字以上。」但一、不限於「經說」每條的首一字，二、不限於「經」文每條的首一字，三、不必說「必」，

四、不可說「此字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必欲加上這四種限制的條件，故「經說下」第五十四條起首的「心中」，梁先生只肯留下「中」字；剩下的「心」字，他改爲「必」字，再改爲「平」字，然後倒移到二十三個字的前面去，作爲第五十四條「經說」的標題。這豈不是太牽强的校勘嗎？又如「經說上」第三條「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梁先生也讀「知材」兩字爲牒題，可見「首一字」的限制，無論是「經」或「經說」，都不可拘泥。第六條梁先生也牒「有間」兩字，與此條相同。又如「經說上」第一，二，三，四，五，六等條，標題的字都是獨立的，不與下文連讀成句。但此項限制並非普遍的。如第二十一條「力，重之謂」；這一類的句子，我們就不能不把標題的字與下文連讀成句了。

況且梁先生對於他提出的這條公例，也不能完全謹守。例如「經說下」近篇末之處有「諾超城員止也……」一大段，依梁先生牒題的公例，這一段應該是「經」文「諾不一利用……」的說了。但梁先生卻把「經說」的「諾」字改爲「言」字，移作「言，口之利也」的「說」的標題；並且把「經」文「諾不一」一段認爲衍文，一齊刪去了！

以上說的是梁先生治「墨經」的一條主要方法。此外梁先生還有一個意見，他說：「今本之『經』及『經說』皆非盡原文，必有爲後人附加者。」我是一個最愛疑古的人，但我對於《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卻不敢懷疑。這幾篇書，因爲難懂

的緣故，研究的人很少；但因爲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僞書的人都不願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因此，我們覺得這幾篇書脫誤雖然不少，卻不像有後人附加的文句。「經上」篇末有「說」字，下注「音利」二字（孫詒讓校改作「言利」，又改作經文），此二字確是很像舊注。此外，我們就不容易尋出後人附加的痕跡了。（梁先生說：「讀此書旁行」五字是後人所加，此似不然。原書亦未嘗不可有這五個字。）

梁先生這個意見，我覺得有點危險。因爲他根據了這個意見，就把「經」與「經說」的原文刪去了好幾段，認爲後人附加的案語。我且舉「經」文的末數行（自「諾不一利用」以下），「經說」末數行（自「諾超城員止也」以下）作一個例：

經上	經說上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𤴓無非	諾超城（張惠言本作成。）員止也相從相去先 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 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 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 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 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

非而不非　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
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這些「經」與「經說」，依我的私見看來，並不很費解。「經」文並無誤字，但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為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今合為一條「經」，讀如下：

諾不一，利用服。執說（舊注「音利」，孫校改為「言利」，是也。但孫說則無理。孫引《埤倉》云：「詁說，言不同也。」今檢任大椿《小學鉤沈》卷八據《集韻類篇》引《埤倉》，作「詁說，言不正」。又《康熙字典》引《埤倉》，亦作「不正」。孫書多誤字，此其一也。「言利」猶言「利口」，即「言不正」之意。言音形似而譌。）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止，因以別道。正，無非。

如此，便不須解說了。「經說」一百三十五字，都是說這一條的，也不必分開。今校讀如下：

諾，超城邑（原作員）止也。相從相去，无（原作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不〕服，難成言。務成之，執（原作九，乃執之壞字。）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止（原作心，依張校改。）愛〔於〕人：是孰宜止（原作心，从張校）？彼舉然也，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𡈼（原作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互諾（互舊譌作五。形似而譌。下同）。人皆於知有說（皆字舊在人字上。今改正。或當在知字下，則更順了）。過互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互諾，若自然矣。

如此校讀，幾乎不須改字，而意義似更明顯。最重要的，乃是一個「止」字的意義。此乃「墨辯」裏的一個重要術語，試看「經下」與「經說下」的第一條，便知此字的重要，又可參證此兩大段。「墨辯」用「止」字之處甚多，但最重要的莫如上篇的末章與下篇的首章。梁先生都改爲「正」，便不好講了。

《墨子》「尚同」各篇深怕「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危險，故主張「上同」之法，——上之所是，必皆是；所非，必皆非之，——很帶有專制的采色。墨家後人漸打破這種專制的正義觀，故「經上」有「君臣萌通約」之說，「經說上」釋此條道：「君，以若民者也。」梁先生校改「若」爲「約」；但「若」字向來訓「順」，正不煩改字，而意義更明顯。末章論「諾」，注重於思辨的方法，眞是「別墨」的科學精神！這樣折服人，自然使人心服，故能做到「互諾」的地位。「正」並不是「上同於天」，乃是「互諾」。「人於知皆有說」，但已經成爲公認的眞

理，如幾何學上的「員無直」，自然沒有話說了。

梁先生校讀此兩大段極重要的「經」與「說」，共刪去「經」文十六字，認爲傳寫的人所妄加；又刪去「經說」「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以下三十一字，以爲讀者所加案語；又把「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八字搬在「正」字之下，「五諾」之上；又把「五諾皆人於知有說」以下二十四個一齊刪去，以爲是複寫的衍文。梁先生說，「所以複寫者，因旁行本下有空格，傳者輒思補滿之，乃將前條複寫，而又譌衍百出。」這種大膽的刪削與心理的揣測，依校勘學的方法看來，似乎有點牽强。校勘家第一須搜求善本，校勘同異。若無善本可以質證，而仍不能不校讎，我們固然有時也可依據普通心理的可能，定校勘的範圍與規律，如「形似而誤」「涉上下文而衍」，等等。但此項校勘的程度，至多不過是一種比較的「機數」(Probability)。故校勘家當向機數最大的方面做去。例如《韓非子》說的「擧燭」一件故事，那種心理上的錯誤便不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因爲一個人寫字時，他的心理上可能的變化，是無窮數的；他也許想到擧燭，也許想到喝酒，也許想到洗腳……校勘家如何揣測得定呢？但這樣一兩個字的誤衍，我們有時還勉强可以用「誤衍」兩字去辦理。至於整幾十個字的誤衍，那種事實的機數，在心理學上看來，差不多近於零點，更不能列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梁先生以爲如何？

這幾點都是關於梁先生著書方法的討論。至於梁先生校釋「墨辯」各條的是非得失，那就不

是這篇短序裏能討論的了。此外，梁先生和我對於「墨辯」的時代和著者等等問題的見解不同，我也不願在這裏答辯。

我很感謝梁先生使我得先讀這部書的稿本。梁先生這部書的出版，把我對於「墨辯」的興趣又重新引起來了；倘我竟能因此把我的《墨辯新詁》的稿本整理出來，寫定付印，我就更應該感謝梁先生了。

十・二・二十六　**胡適**

〔附錄一〕梁任公先生來書

適之我兄：

奉函及所賜「墨經校釋序」，懽喜無量。此種序文，表示極肫篤的學者態度，於學風大有所裨，豈惟私人紉感而已。嗣復奉讀大著《墨辯新詁》稿本；撢繹終篇，益感共學之樂。除隨手簽注若干條外，對於尊序所討論者，更願簡單有所商搉：

公對於吾所提出之牒經標題公例，謂定得太狹窄，此論吾亦表相對的敬佩。吾之公例所下字，誠不免過於嚴格。但我終信此公例確爲「引說就經」之一良標準。在全書中既有什之八以上不煩校改而得此例正確妥帖之適用。其餘一二，亦引申觸類而可通，何爲而不用之？故謂時有例外焉則可，謂此例不足信憑，則不可

也。其所以牒經文首字者，正如宋本書之夾縫，每恆牒書名之首一字，初不問其字之爲通爲僻，能獨立不能獨立。如「經說下」第七條、第七十五條所牒之「不」字，第四十三條所牒之「所」字，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條、第七十四條所牒之「無」字，若非適用此例，則其字皆成贅疣。公謂「不應牒出最常用之字」，似非然也。

「經上」「經說上」之末數條，吾亦未敢深自信，且自覺有不安處。然於公之所釋，抑又不能無疑。第一：依尊說將原文六條合爲一條，共爲三十六字。《墨經》文極簡，「經上」尤甚。其長至十一字者僅兩條，餘皆十字以內；其文體純似幾何書之界說。如公所說，則此處忽爲說明的文體，與全書似不相應。第二：公所以將此六條合爲一條，其理由，謂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爲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墨子》每簡若干字，今無可考。然《漢書》「藝文志」稱《尚書》脫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聘禮疏」引鄭注云：「《尚書》三十字一簡」；今本《禮記》「玉藻」錯簡數處，或三十五字，或三十一字，或二十九字，或二十六字；「汲冢穆傳」則簡四十字；可見古籍蓋以每簡三十字內外爲中數。則此三十三字，斷無分爲六行之必要。即合以上排之「化徵易也」至「動或從也」十九字，至多亦兩簡已足，何至分爲六簡。「經下」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一條，亦已二十三字，然不聞分爲兩行或三行，致爲下排所間斷（此條在「經」中為最長，假定上下排必同簡，則此簡合下排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共三十二字）。此外「經下」之上下兩排合二十餘字成行者甚多。即「經上」之「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一行，亦已共十九字。彼皆不聞以簡短間斷，則公所謂因每行平均五六字以致間

隔者，恐不合事理。鄙意以爲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間，應認爲「經」文每條界線之唯一標準。其今本文相連屬者如「經上」之「知聞說親名實合爲」八字，應爲一「經」，或爲兩「經」，尚可以成問題；如「經下」之「物盡同名」至「說在因」三十一字應爲一「經」，或爲兩「經」、三「經」，尚可以成問題。其餘兩排相間者，則條與句之斷連，不應更生問題。今於原文之「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將「損偏去也」四字抽出，而以「諾不一利用服」爲句；於原文之「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將「動或從也」四字抽出，而以「法異則觀其宜止」爲句。則「經上」發端，何不可以「故所得而後成也體」爲條爲句；「經下」發端，何不可以「止類以行人說在同異」爲條爲句？則「經」之系統且紊矣。故公所持「六條合一」之說，吾始終不敢贊成。此亦治「墨經」方法之一種討論，願公更有以教之。

至公之詰此條，誠別有妙諦。但「六條合一」之說若不成立，則諦雖妙恐未必原書之意矣。若吾於「正五諾」以下三十五字疑爲複衍，細思亦覺其武斷。此蓋「正無非」「經」文之「說」，但未敢強解耳。

復次：吾謂此書有後人附加，公之所難，於吾原意似有未瑩。公謂：「……因爲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僞書的人都不願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吾之「讀墨經餘記」固明云：「但附加者仍必出先秦人之手，且爲忠於墨學者之所爲；非劉歆、王肅輩有意竄改古籍。」質言之：則吾所疑附加之人非他，乃公孫龍、桓團之流也。別人誠覺此書難解，研究者少，龍、團之徒固不爾。其誦習之而有所案識增益，實意中事；此非可以與作僞者同科也。《論語》「季氏篇」末「邦君之妻……亦曰君夫人」共四十三字，與書文義毫無關係，其必爲後人附加無疑；然其動機卻非在作僞。古書如此類者不少（《禮記》「王制」「玉藻」諸篇皆

有之）。吾所謂「經說」有附加者，乃研究之結果，而爲有意義的附加，固不容援此爲例；但以證明附加與作僞不同，不能以無作僞之故便斷爲無附加耳。要之吾觀察此書，與我公立腳點有根本不同之處。公奪此書於墨翟之手以予公孫龍、桓團，謂此四篇與「大取」「小取」，皆戰國末年同時全部產出。其不認此後更有人附加宜也。吾則謂不惟六篇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即此四篇亦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雖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然卻是同出一派。百餘年間，時有增飾。故其思想雖同一系統，而微有演變。即文體亦然。「經說下」與「經說上」文體繁簡不同，至易見；可以推定下篇較爲晚出。其上篇文體有類似下篇者，則吾疑爲晚出所附加，其非原本也（如「欲雜其指」一條，文體確與全篇不類）。故吾對於「經說上」疑爲附加者數處，對於「經說下」則甚少也。此問題與「大乘是否佛說」之爭頗相類：公奪此「經」以與公孫龍、桓團，是猶謂大乘經典皆馬鳴、龍樹輩創造，則無附加非附加之可言。我則謂大乘經典實出釋尊，而數百年間，遞有增益也。吾所謂附加者，其界說如是，願更察之。

大著《新詁》已精讀一過。雖意見不能盡同，然獨到處殊多可佩。其有不敢苟同者，輒簽注若干條，附繳。拙稿覆勘，所欲改者又已不少；棄於他業，輒復置之；即以呈公之原稿付印。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自感其不足；必欲爲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然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於世於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新詁》，作速寫定；不必以名山之業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

十年四月三日　**啓超**敬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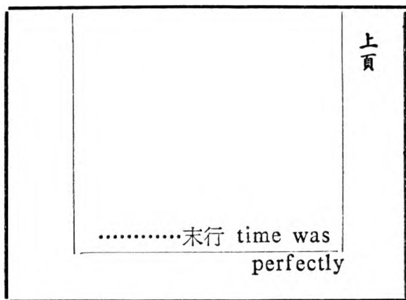
〔附錄二〕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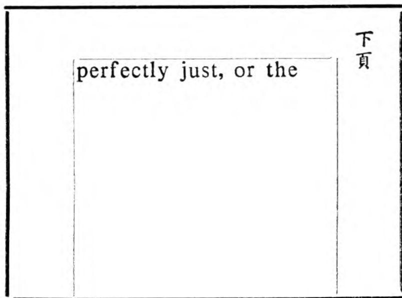
任公先生：

上星期五收到先生的信和還我的《墨辯新詁》稿本。先生答我的書，也讀過了。先生勸我早日整理出版，這話極是。我常說，我們著書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絕後」。但近年頗中清代學者的毒，每得一題，不敢輕易下筆。將來當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對不住讀者的期望爲標準。

先生對於我那篇匆促做成的序文，竟肯加以辯正，並蒙採納一部分的意見，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敬佩敬佩。我對於每條帖題的辦法，序中似亦申明，認爲可用，但不可太拘泥。我在序中提出四條修正的條件，只是要使先生這條方法的應用更爲靈動。我將來校改《新詁》時，當參用此法，以副先生的期望。

先生說，「其所以牒經文首字者，正如宋本書之夾縫，每恆牒書名之首一字，初不問其字之爲通爲僻，能獨立不能獨立。」此喻實不甚切。宋本書夾縫中亦不「恆」牒書名之首一字。西文古本書每頁之末行之下方往往複寫下頁之首一字，以示銜接，例如：





此係 1808 年版的 Rurke 全集

此例似較切，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論「經上」「經說上」末數條，於我說的「『墨經』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之說，有所指正。此處先生的誤解，實由於我措辭不完密。「墨辯」當初必係上下雙行的，——此殆無可疑，——我說的「每行」乃是單指上行或下行，故下文說「爲上行所隔開」。以此計之，每一全行大概足容十一二字。先生所說的「每簡三十字內外」與我所說「每行」若干字並無衝突，因爲每簡必不止一行，古書所謂「錯簡」乃是全簡，如今之倒頁，並非簡中一行有錯也。

至於此諸條我所以敢合爲一條，實因「經說上」末段確是一片連貫的文字，故敢合經文爲一條。每行五六字之說乃是解釋經文所以分開之故。試看「讀此書旁行」五字之在「症無非」之上，可知原書末數排的排列，似與行款有關。

先生舉出「化徵易也」至「動或從也」十九字，說「至多亦兩簡已足，何至分爲六簡」？這又是先生

認「簡」爲「行」的錯誤了。

先生的根本主張，說「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間，應認爲『經』文每條界線之唯一標準」。此即向來沿用的方法，我也曾如此試過，但終不滿意。後來細讀「經說上」的末段，乃斷爲一條，迴看「經文」，亦成一片，然後疑寫經者習於全篇「每行成一條」的通例，嚴守此例，遂將此一條長的「經文」照例寫成六截。此乃很自然的機械作用的一種，正不須強爲解說。先生以爲如何？至於先生舉的「經下」諸條的例，似不可與「經上」末條相提並論。「經下」每條以「說在」爲例，不易誤分，故雖長至二十餘字，亦不至被截作幾段。「經上」則不然，全篇體例甚雜，自篇首至「爲，窮知而縣於欲也」，約七十五條，又是一種體例；「聞，耳之聰也」數句又是一種體例；「諾不一」以下又是一種體例。這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爲體例不同，故寫者容易以拘於成例而致誤，故我們也應該分別研究，不可用一個通則來包括這種種不同的體例。此一層最重要，深望先生注意。

至於先生論「墨辯」究竟爲何人所作一段，非一短札所能討論。況先生認「大乘經典實出釋尊」，則我與先生的「立腳點」誠有根本不同之處，雖辯至萬言，亦終無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說以供讀者之自擇。先生以爲何如？

承先生爲我的《新詁》校箋若干條，已一一讀過，深謝先生的盛意。中有幾條，我在《哲學史》裏已自己改了，但未加入稿本。如「化，徵易也」一條，我在《哲學史》[1]（頁二五六）裏亦主張不改字，但楊氏謂「驗其變易」之說似亦不可從，故我訓「徵」爲表面上的徵驗。

收到來信之次晨，即赴天津演說，故不及作答。今日匆匆作答，亦不及鈔正，乞恕之。

胡適敬上　十・五・三

1 參見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三十一冊《中國古代哲學史》。

論墨學

一、章行嚴先生的「墨學談」

邇來誦《墨經》者日多，談士每好引經中一二事以相高。梁任公、胡適之尤有此癖。愚亦不免。任公著《墨經校釋》，自許甚厚。適之著《墨經新詁》未成，僅以其所詁「小取」一篇，及雜論經文者布於世，而自許尤至。東南大學教授張子高，注「經」數十條，獨闢蹊徑，適之與愚俱見其稿本而歎服焉，惜未刊出。別有漢陽張仲如著《墨子閒詁箋》，論域及於全墨，蓋不拘拘於墨辯者，難與並論。而吾兄太炎言墨獨先，所論雖不多，精審莫或過之，蓋自張皋文以迄適之，言墨學者，終推吾兄祭酒，非敢阿也。

獨怪任公稱吾兄之書「深造蓋邁先輩」，而於其書則讀之未審。「經」曰：「以言爲盡誖，誖，說在其言。」吾兄講之曰：「謂言皆妄，詰之曰，是言妄不，則解矣。」此義既樹，來者焉

能更下他語？而任公曰：「經文之意，謂以某人之言爲盡詩者，詩也，亦視其所言何如耳。」如作高頭講章然，不得謂非吾兄原名一篇曾未寓目也。

惟任公有時闕疑，不似適之武斷。「經」以無間無厚詁次，乃釋動之精義。任公曰：「次何以必須無間無厚，未得其解。」實則望文生義，解並不難。蓋兩點相接曰次。必無間而後眞相接，必無厚而後不交加。一防接之不及，一防接之太過，意甚顯明，任公猶愼於下筆如此。而「經」曰：「辯爭彼也。」爭彼一義，墨學之骨幹，而亦吾名學全部之骨幹也。愚曾在《東方雜誌》作「名學他辯」一首言之：他者彼也。他辯出公孫龍子，與西方邏輯之言媒詞者相類，不解此義，名學殆不能講。適之獨謂彼爲誤字，以《廣韻》引《論語》子西佊哉爲例，佊誤作彼，而佊與駁通，爭佊猶言爭駁。試思「墨經」一義何等矜貴，以此種語贅歸之，豈非陷全經於無意義？然適之不之顧也。

凡前所談，以見墨學雖一時貴盛，時流探索，不遺餘力，而新剖不多，義蘊之資以宣洩者，無甚可紀。甚矣絶學之未易治，而先民之沾溉後人爲至遠也！

尤可慨者，名墨流別如何，至今無能言之。任公、適之均見及「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之學說「關係最當明辯」，惜乎辯而未明，緻繞益甚。其最大誤處，在認施龍輩爲別墨。別墨之名，出於「天下篇」。適之謂墨者以之自號，示別於教宗之墨家，不知魯勝序《墨辯注》，有「以

正別名顯於世」一語。別者別墨，而正者正墨。旣有正墨之稱，別墨乃以蔽罪他家無疑。任公不認適之別墨卽新墨學說，所見已進一步。惟施龍之學「確從『墨經』衍出」，兩人所見又同。其故則「《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經』」（適之說）。夫施龍祖述墨學，其說創自魯勝，以前未嘗有聞。《漢書》「藝文志」載九流所出，名墨並稱，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吾兄亦言「惠施、公孫龍名家之傑，務在求勝」（「原名篇」）。《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兩家相君以「求勝」，名迹俱大。所蔽之性，恰又得反。謂爲師承所在。詎非讕言？諸家徒震於兩子說事之同，所含義理，復格於問學，未暇深考，遂不期而雷同魯說，遇有一事互見，則坐指爲辭旨相叶，比附未遑。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斱，則不動，說在端」；凡注墨者，率謂此卽惠義，而不悟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辭序徵之，似惠爲立而墨爲破（「墨經」非墨子手著之書）。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蓋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於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世；何也？尺者端之積也，端乃無序而不可分（義出「

墨經」）；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餘，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遺其餘，餘端凝然「不動」，不能斷，卽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斷，則「不動」，說在端。此其所言果一義乎？抑二義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從來治墨學者，未或道及；卽明銳愼密如孫詒讓，曾謂「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者，於此且一致爲魯勝之說所欺，無怪夫墨學之不能大昌明也！

愚方爲《東方雜誌》二十年紀念號草「名墨訾應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條，以證名墨兩家「倍譎不同」，決非相爲「祖述」。愚說如其有當，將爲墨學起一翻案，後爲斯學，取徑宜不同前。愚喜其爲攻墨之一新趨，因別舉概要，列於茲篇，用質當世聞家，並候吾兄教。

二、章太炎先生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爲精審。非半勿斷一條，與惠氏言取舍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爲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

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爲，而非汎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旨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强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爲爭佊，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以訓詁說經，則云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以此爲說，乃成駢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尉。此問起居康勝。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只曉得經與子同爲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卽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志》與《經義述聞》，《羣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爲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麼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

胡適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書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之來書，謂校勘訓詁，爲說經說諸子通則，並擧王俞兩先生爲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卽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

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爲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衆，說者亦就爲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可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云，「辯，爭彼也」，則可；墨家爲辯云，「辯，爭彼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爲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云「辯，爭也」，此文亦祇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爲界說，而未有爲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云，「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云，「天，顚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顚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亦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面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云，「線，索也」，「面，幂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爲例，雖

學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辯猶且不可，而況「爭佊」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爲多。諸以同義之字爲直訓者，在吾之爲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復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爲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五、我的第二書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爲《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爲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敎。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種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爲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工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爲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淸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愜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了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雖校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爲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爲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非薄初步而不爲。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爲初步，其謹愼眞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既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爲騃語，謂爲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上」原文爲三條：

攸，不可兩不可。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云：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攸字吳鈔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爲佊字之譌，理由有三：一、攸字篆文𢼸，最近佊字，而與從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譌爲彼，此因鈔胥不識佊字，改爲彼字，有《論語》彼哉彼哉一條可爲例證。三、佊字之義，「墨經」訓爲「不可兩不可」，此爲名學上之矛盾律，「經說」所謂「不俱當必或不當」，釋此義明白無疑。此種專門術語，決無沿用彼字一類那樣極普通的代名詞之理。而詖字有論辯之義，佊詖同聲相通叚（佊字《埤蒼》訓邪，是與詖頗通用），故定爲佊字。

知佊字在「墨辯」爲專門術語，然後知以爭佊訓辯，不爲語贅，不爲直訓。

太炎先生說：「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爲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我於「爭佊」之訓，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誤解，殆起於《哲學史大綱》[1] 頁二百之以駁訓佊。此因當日著書，過求淺顯，反致

誤會。然注中亦引不可兩不可之訓。在精治名學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當能承認彼字之術語的涵義，不應以爲贅語也。匆匆奉白，順便告行。

胡適 敬上

1 參見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三十一册《中国古代哲學史》。

《章實齋年譜》自序

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籐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文獻徵存錄》裏確有幾行小傳，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張字！所以《耆獻類徵》裏只有張學誠，而沒有章學誠！譚獻確曾給他做了一篇傳，但譚獻的文章既不大通，見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實齋的課蒙論！因此，我那時很替章實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一百二十年後方才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蹟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這眞是王安石說的「世間禍故不可忽，簣中死屍能報讎」了。

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籐先生作的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

書》的目錄全鈔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鈔這部《遺書》，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鈔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內籐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都在這書裏面，我就隨時在《內籐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籐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內籐譜》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別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注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這便是我作這部年譜的緣起。

民國十年春間，我病在家裏，沒有事做，又把《章氏遺書》細看一遍。這時候我才眞正了解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我覺得《遺書》的編次太雜亂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條理層次；《內籐譜》又太簡略了，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見他的思想學說變遷沿革的次序。我是最愛看年譜的，因爲我認定年譜乃是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最好的年譜，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如錢德洪等的《王陽明先生年譜》，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若年譜單記事實，而不能敍思想的淵源沿革，那就沒有什麼大價值了。因此，我決計做一部詳細的《章實齋年譜》，不但要記載他的一生事蹟，還要寫出他的學問思想的歷史。這個決心就使我這部《年譜》比《內籐譜》加多幾十倍了。

我這部《年譜》，雖然沿用向來年譜的體裁，但有幾點，頗可以算是新的體例。第一，我把

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摘錄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幾句。凡刪節之處，皆用「……」表出。刪存的句子，又須上下貫串，自成片段。這一番工夫，很費了一點苦心。第二，實齋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話，也有很錯誤的話。我把這些批評，都摘要鈔出，記在這幾個人死的一年。這種批評，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來的傳記，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我這部《年譜》，不但說他的長處，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例如他批評汪中的話，有許多話是不對的，我也老實指出他的錯誤。我不敢說我的評判都不錯，但這種批評的方法，也許能替《年譜》開一個創例。

章實齋的著作，現在雖然漸漸出來了，但散失的還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沒有見着他的《庚辛之友亡友傳》。《年譜》付印後，我才知道劉翰怡先生有此書；劉先生現在刻的《章氏遺書》，此書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後，定可使我們添許多作傳的材料。劉先生藏的《章氏遺書》中還有《永清縣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沒有見過。我希望劉先生刻成全書時，我還有機會用他的新材料補入這部《年譜》。

章實齋最能賞識年譜的重要。他在他的「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說：

> 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爲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闕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刋傳前達文字，愼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

照他這話看來，他的著作應該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現在所傳他的著作只有極少數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時的刻本《文史通義》已沒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遺書》與內籐藏本目錄也都沒有年月。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誰料說這話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這一件「大錯」呢？我編這部《年譜》時，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編注；那些沒有年月的，如有旁證可考，也都編入。那些全無可考的，我只好闕疑了。

我這部小書的編成，很得了許多認得或不認得的朋友的幫助。我感謝內籐先生的《年譜》底本，感謝青木先生的幫助，感謝浙江圖書館館長龔寶銓先生鈔贈的集外遺文，感謝馬夷初先生借我的鈔本遺文，感謝孫星如先生的校讀。

十一・一・二十一　在上海大東旅社

《淮南鴻烈集解》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鈎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二十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終歲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敎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於漢代，時尚修辭；今觀許愼、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淸兪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兪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尚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愼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顧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口鼻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愼。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俞樾校云：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憑莊本立說，可笑

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眞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墬形訓」云：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逵吉校云：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叔雅校云：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碻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爲「旡」，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卷四，頁九。兌即今銳字。）

此條精碻無倫，眞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並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並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九引，作：

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拶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愼。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頁「甚淖而滒」，高注曰，「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滒，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瀋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滒滒」，滒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嚾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考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嚼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卽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溪人詈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並

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　胡適

胡適作品集

胡適原著／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1. 四十自述
   附胡鐵花先生年譜一種
2. 胡適文選
3. 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一卷
4. 問題與主義
   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
5. 水滸傳與紅樓夢
   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三卷
6. 貞操問題
   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卷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一卷
8.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二卷
9. 我們的政治主張
   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三卷
10. 西遊記考證
    胡適文存第二集第四卷
11.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一·二卷
12. 海外讀書雜記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三·四卷
13.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五·六卷
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七·八·九卷
15. 說儒
    胡適文存第四集第一卷
16. 神會和尙傳
    胡適文存第四集第二卷
17. 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文存第四集第三卷
18. 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文存第四集第四卷
19. 白話文學史（唐以前）
20. 白話文學史（唐朝）
21.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
    附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一種
22.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下）
23. 丁文江的傳記
24. 胡適演講集(一)
25. 胡適演講集(二)
26. 胡適演講集(三)
27. 嘗試集
28. 嘗試後集
29. 胡適選註的詩選
30. 胡適選註的詞選
31. 中國古代哲學史
32. 戴東原哲學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34. 胡適留學日記(一)
35. 胡適留學日記(二)
36. 胡適留學日記(三)
37. 胡適留學日記(四)

20世紀影響中國思想最深的偉人巨著

胡適作品集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遠流出版公司說：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引自「出版前言」

●胡適之先生說：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引自「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大字精印●每冊售價100元●全省各大書局有售●
寺報出版公司●郵撥：0103854-0●電話：306-6842

遠流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電話：392-3707　郵撥：0189456-1遠流出版公司



胡適作品集

•即將出版37冊•

1. 四十自述
2. 胡適文選
3. 文學改良芻議
4. 問題與主義
5. 水滸傳與紅樓夢
6. 貞操問題
7.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8.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9. 我們的政治主張
10. 西遊記考證
11.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12. 海外讀書雜記
13.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15. 說儒
16. 神會和尚傳
17. 醒世姻緣傳考證
18. 我們走那條路
19. 白話文學史：唐以前
20. 白話文學史：唐朝
21. 中國中古思想史小史長編(上)
22.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下)
23. 丁文江的傳記
24. 胡適演講集(一)
25. 胡適演講集(二)
26. 胡適演講集(三)
27. 嘗試集
28. 嘗試後集
29. 胡適選註的詩選
30. 胡適選註的詞選
31. 中國古代哲學史
32. 戴東原哲學
33. 章實齋先生年譜
34. 胡適留學日記(一)
35. 胡適留學日記(二)
36. 胡適留學日記(三)
37. 胡適留學日記(四)